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名扬海外的中国人



名扬海外的中国人

华侨旗帜——陈嘉庚

1961年8月12日,享年88岁,德高望重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在北京逝世。临终前,他留下的遗嘱是:国内尚有存款300万元,全部献给国家。其中50万元作为北京华侨博物馆的建筑费;50万元给集美学校作福利基金,200万元做为该校的校舍建筑费。有人替他算了一笔帐,他一生为教育事业至少献出了一亿五千万。所以在悼词中,对他高度地评价道:“陈嘉庚先生是华侨的领袖人物,是一个爱国、爱乡,热心公益教育事业的爱国老人。”

陈嘉庚漫长的一生,充满着许许多多令人由衷敬佩和感叹的业绩。

国难当头

陈嘉庚1874年10月21日出生于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的一个华侨世家。他的曾祖父兄弟五人就有两人出洋定居,父亲和两个伯父也出过洋。

陈嘉庚的家乡集美是个不大的半岛,三面环海,土地很少,居民全部姓陈,主要以捕鱼和养殖为生,十分贫困,所以不少穷苦农民只好背井离乡到南洋一带去谋生。

陈嘉庚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国难深重的环境中成长的。他出生那年,日本进犯与集美遥遥相望的台湾,强占琉球为其属国;他11岁时,爆发了中法马尾海战;他21岁出洋时,清朝签订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奉送给日本;当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祖国再次面临列强瓜分的危机时,陈嘉庚回到家乡居住了三年。

集美在历史上有过光荣的传统,反清抗荷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在这里建立过基地,留下了许多令人敬仰的遗迹,这一切在陈嘉庚幼小的心灵中,植下了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种子。

陈嘉庚9岁入私塾读“三字经”、“四书”,识字不多。后来能够写文、著书,完全靠自学。

1884年,陈嘉庚11岁时,由于法国侵略者的野蛮行径,家乡父老有一半惨遭屠杀,人们纷纷逃难,陈嘉庚也失了学。后来,父亲便叫他去新加坡经商。于是,他便怀着国耻和民族的仇恨离开了故土家园。

海外创业

到新加坡的前13年,陈嘉庚一直在父亲经营的顺安米店服务。1904年,陈嘉庚集资了一笔钱,先创设了一家菠萝罐头厂,不久又接管了也是经营菠萝罐头厂的日新公司,两个厂在三个月中获利近四万元,使陈嘉庚深受鼓舞。

这时,橡胶刚刚移植到马来亚,年轻的实业家陈嘉庚立即看出它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花两千元购买了橡胶种,播种在菠萝园内。到1925年,他便拥有橡胶园一万五千英亩,成为华侨中最大橡胶垦殖者之一。随后,他首创大规模生产橡胶制品,开办了橡胶制品厂,生产胶鞋、轮胎和日用品,促进了侨居地民族工业的发展。接着,他有计划有组织地开辟了橡胶制品和其它制品直接输出的国际市场,先后在国内各城市、南洋和各国大埠设立分销店100多处,直接代理商遍布五大洲。在华侨中第一个打破英国垄断资本的垄断局面。

此外，陈嘉庚还经营米厂、木材厂、冰糖厂、饼干厂、皮革厂等等，厂房达 30 多处。

陈嘉庚在创立自己的事业时，念念不忘为祖国的民族工业训练人才。他意识到，橡胶工业如此蓬勃发展，日本尚且有 400 多个胶厂，而我中华泱泱大国，竟没有一所像样的胶厂，实在不相称。他决心利用新加坡产胶区域内的设备，培训熟练职工，以备将来回国发展自己的橡胶业。

倾家兴学

反对清王朝的革命浪潮强烈地冲击着南洋的华侨社会，新加坡成了当时革命党人的活动中心。陈嘉庚深受革命党人激进思想的影响，经友人介绍，他认识了孙中山，听了孙先生的演讲，十分佩服，于 1910 年加入同盟会。次年，武昌起义成功，福建光复，陈嘉庚立即筹款支援革命政府。

辛亥革命胜利后，陈嘉庚想起自己家乡由于文化落后，学校极少。为了支持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事业，他感到普及教育是当务之急。

1913 年，陈嘉庚首先在家乡创办“乡立集美两等小学”，随后陆续增办各种类型学校，如男小、女小、男师范、男中、女中、商业、农林、幼稚师范、国学专门学校等。陈嘉庚深感中国造船业太落后，竟没有资格参加国际航业注册，这件事似国耻一般刺痛他的民族自尊心。他决心开办水产和航海学校。先派人到日本留学，培训师资，还从欧洲买回机器，造了一艘渔轮，供学生出海实习使用。建校同时，他还开设了幼稚园、医院、图书馆、科学馆、教育推广部等，以上机构统称集美学校。1923 年，孙中山批准“承认集美为中国永久和平学村。”在当时，这是全国唯一的一个规模宏大、体系完备的“学村”。

陈嘉庚兴学有个十分鲜明的特点，就是主张免费生越多越好，特别注意吸收贫苦人家的子弟入学，有利培养更多的人才。在集美学校的校歌中，有着明确的校训：“‘诚毅’二字心中藏，大家勿忘，大家勿忘”。这是他办教育的精神和目的。

1918 年，陈嘉庚随着自己实业的强大，他决定在家乡筹办厦门大学。这是陈嘉庚兴学史上与办集美学校并列的又一座丰碑。他非常清楚，福建高等教育落后，高级专门人才和中等学校师资都无处培养，创办大学就是为了解决这两大难题，这是他爱国兴学思想的集中表现，也是他“诚毅”宗旨的集中体现。1919 年 7 月，陈嘉庚在一次有 300 多位各界人士参加的大会上，宣布了办大学的目的和计划。他在讲话中，一再强调中华民族不能屈居他人之下，甘受欺辱，唯有兴办教育才能拯救国家。他明确表示：今天达不到目的，还有明天；自己达不到，还有子孙后代。陈嘉庚是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办教育的。在这次会上，他当场捐款开办学费 100 万元，经常费 300 万元，分作 12 年支出，每年 25 万元。以后，他还进行了广泛的募捐活动，筹措资金。陈嘉庚为厦大支付捐款坚持了 16 年，直到该校改为国立为止。

在世界经济不景气，华侨企业面对艰难处境时，有人曾劝阻他停办集美和厦大，但他仍坚定地说：“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他果真将自己的三座大厦卖掉，作为厦大的维持经费。

陈嘉庚还以同样热诚发展侨居地的教育事业。从 1913 年起，他在新加坡创办和赞助了许多小学、师范、水产航海学校，以及南洋第一所华侨中学。

在他的带动下，南洋各地兴办起数千所华侨中学。

陈嘉庚不论在中国大陆还是海外办教育，数十年如一日，历尽曲折，捐资兴学达 70 余所，为国内外培养了一大批专门人才。他们对国家的建设，人类的文明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新的事业

抗战期间，陈嘉庚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阻挠，亲自率领南侨总会组织的“南侨慰问团”回到祖国劳军。于 1940 年 5 月底抵达延安，进行了为期七天的参观访问，会见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高层领导人，进行了多次深入的交谈，思想认识上出现了飞跃的变化。从此，他把民族的命运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身上。

陈嘉庚回到新加坡后，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威胁恫吓，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政府贪污腐化，假抗日真反共的本质，称颂中国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及其英勇抗战的功绩，使广大海外侨胞得以了解事情的真象，对维护抗日统一战线起了积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邀请陈嘉庚回国参政，共商国是。陈嘉庚终于回到了“梦寐以求”的解放了的祖国，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会上，他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随后，他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

1950 年，陈嘉庚返回新加坡，在华侨中大力宣扬新中国的新面貌、新气象，对华侨进一步了解新中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他结束了未了的合营企业，把款项全部汇回国内，准备扩建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几个月后，他回国定居在心爱的家乡集美，以“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气魄，开始了扩建厦门大学校舍的工程。扩建后的厦门大学以建南大会堂为中心，东有物理馆、图书馆，西有化学馆、生物馆，五座大楼并列一排，巍峨壮丽。建南大会堂有座位 5000 个，为全国高等学府规模最大的礼堂。上弦运动场可容纳观众 20000 人，游泳池面积 6000 平方米，都很壮观。

陈嘉庚对福建建设十分关心。他实现了“建设集美文化区和风景区”的夙愿和宏图；通过他的积极倡议和努力，鹰厦铁路提前在 1956 年通车，结束了全省没有一寸铁路的落后历史；他倡议移山填海，修建厦门集美海堤和集美杏林海堤，使厦门市的发展迈上了新台阶。

1956 年，中华全国归侨华侨联合会成立，陈嘉庚当选为主席。

高风亮节

陈嘉庚是东南亚一带有名的大实业家，是位富翁。他的钱常以数万、数十万、数百万地捐献给公益事业，但他对自己，对家人都要求十分严格，从不挥霍浪费。他身体力行的座右铭是：“应该用的钱，千万百万也不要吝惜，不应该用的钱，一分也不要浪费！”

陈嘉庚从不为孩子积财，他认为：要为社会服务，就不能为子女多算计，若想为子孙们算计，就不能尽力为社会服务。陈嘉庚爱子女，但他更爱教育事业。为了办教育，他投入了自己一生所挣的钱财，没有给自己的亲骨肉留下任何遗产。逝世前他有过这样的遗嘱：为了鼓励子孙回国升学，如有生活

困难，每月可以从集美福利基金中支取 20 元。以后有了工作，还要从工资中扣除。

陈嘉庚不图享受，衣食住行都很一般。他说：“与其吃了不安，不如不吃。”晚年时，他的生活依然朴实无华。他自己规定伙食标准每天五毛钱，常吃番薯粥、花生米、豆干、腐乳加上一种鱼。就是招待客人也不外乎是一些家乡风味，从不奢侈。他的居室中，只摆着旧式木桌木椅，一张古老的床，一张半旧的写字桌，两个不配套的沙发，几张凳子。

陈嘉庚 80 寿辰时，谁也不敢为他祝寿。他不愿意听到对自己的赞扬，或者以他的名字为学校建筑物命名。他尽力推辞对他的褒奖，真正做到了忠心报国，不图名利。

陈嘉庚的高尚品格，在生前就得到海内外各界人士的高度评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当陈嘉庚从躲避日寇追捕的印尼安全回到新加坡时，毛泽东主席为他书写了：“华侨旗帜，民族光辉”，这是对他的最高评价；周恩来等人也为他祝词：“为民族解放尽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受无限苦辛，讻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庆安全健在，再为民请命。”

开创物理学的新纪元——丁肇中

关心科学事业发展的青少年朋友可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为了阐述深奥繁复的科学理论，一些学者在编撰专著时，往往采用这样一种界定的方式，即使用了发现“J粒子之前”和发现“J粒子之后”的说法，以此来确认某些科学理论的分界线。可见J粒子的发现对高能物理学之贡献的意义是何等重大。

什么是“J”粒子？谁发现了这个粒子？

坚定的志向

宇宙是广阔无际的，有着许多奥秘。发现“J”粒子，就是发现了原子核中几百种粒子中重量最大、寿命最长的一种，它的寿命比其它粒子长一万倍，为人类研究宇宙开拓了道路。“J”粒子的发现，是物理学界的重大成果，这位创造奇迹的人就是咱们的炎黄子孙，美籍华裔科学家丁肇中。

丁肇中祖籍是山东滨海的日照县。1936年1月26日他出生在美国的密执安州的安阿伯。当时他的父亲正在密执安大学读书。丁肇中父母学成归国之际，迎接他们的是艰难困苦的抗战岁月。和祖国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一样，他们全家开始了艰苦的逃难生活，经过长途跋涉于1939年抵达重庆。

抗战期间，丁肇中的家庭生活虽然非常清苦，但夫妻二人对孩子的教育却抓得很紧。尽管日寇飞机经常狂轰滥炸，丁肇中无法正规上学读书，然而在父母的精心辅导下，学业进步很快。父母亲严谨的治学精神在孩子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抗战胜利后，由于时局的动荡和变迁，丁家移居到了台湾。中学时代的丁肇中是个出类拔萃的学生。高中毕业时，他以数学、化学各100分，物理97分的优异成绩被保送上台南成功大学的机械工程系。但丁肇中的最大兴趣是在物理学方面，所以，他毅然参加高考，但是未能被录取，他只好怀着闷闷不乐的心情去读机械工程学。一年后，虽然他的成绩在班级中遥遥领先，但他仍未放弃自己的志向。当他向父亲陈述自己的愿望时，父亲惊喜地望着成长中的孩子，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学工程好坏都可以吃饭，而学物理却需要上乘的功夫，你认为你将来有能力跻身物理学界吗？”丁肇中坚定而自信地告诉父亲：“事在人为，只要我埋头努力，我想我是会的。”

在胸有成竹的年轻人面前，机遇的大门总是敞开的。正当丁肇中加紧学习准备转学考试时，父亲的一位美国朋友布朗教授应邀来台访问，他见丁肇中聪明好学，十分喜爱，便答应帮他申请奖学金赴美学习。这是他生活道路上的一次重大的转机。

寻找“J”粒子

1956年8月，怀揣100美元的丁肇中来到美国的密歇根大学工学院就读。一年后，经过一番周折，他才如愿以偿地转入该校的理学院读书，从此跨入物理学的大门。1959年，他取得了数学和物理学方面的两个工学学士学位，1960年获得理学硕士学位，1964年获得物理学方面的哲学博士学位。次年，他作为福特基金会的研究员，在瑞士的西欧核子研究中心进行核研究，

并在哥伦比亚大学短期任教。这期间，他由于发现重氢分离离子而引人注目。后来，他又先后发现了抗氢同位素和证实了量子电动力学的正确性而崭露头角。

1967年，丁肇中转入麻省理工学院执教后，随即开始了一项耗资巨大又十分艰巨的寻找新的基本粒子的实验。为了说明这项实验的复杂性，他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在雨季到来时，一个类似波士顿的城市，也许在一秒钟内会降落千万颗雨滴，其中有一滴不同颜色的雨滴，我们必须把它找出来。

1972年，丁肇中在布海汶国家实验室与同事们运用一台三百亿电子伏的质子加速器去寻找新粒子。由于这项实验费用高，难度大，有人公开表示反对。面对重重困难，丁肇中毫不动摇自己的信念，坚持走自己确定的道路。1974年夏秋之交，丁肇中的实验进入到关键的时刻，当他们将粒子质量的方位降到30至40亿电子伏这个范围进行搜索时，果然出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新粒子，它以极长的寿命分解出正负电子。丁肇中他们兴奋极了。但是，严谨、慎重的科学家并没有立即宣布这一惊人的发现。从8月到10月，他们又进行了多次这样的实验，直到取得确凿无疑的数据后，丁肇中才于1974年11月12日郑重其事地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一划时代的成果。

科学史上有许多偶然的事件。正当丁肇中在美国东部从事这一实验时，在西海岸，美国的物理学家B·里克特也发现了这一新粒子，而且他们发表的实验报告几乎完全一样，只是称谓不同。丁肇中称这种新粒子为“J”，B·里克特呼之为“ ψ ”。到底是谁最先发现这种新粒子？这成了一桩难以分解的悬案。尽管有位教授出面证实是丁肇中最先发现的，但他始终不加任何评论。最后，1976年的诺贝尔物理奖同时授给了丁肇中和B·里克特这两位杰出的科学家，他们所发现的新粒子被称之为J/ ψ 粒子。

第一份用中文书写的答词

丁肇中的重大发现公布之后，瑞典皇家科学院的G·埃克斯邦把这一成就称为“基本粒子领域的最大发现之一”。诺贝尔奖自1901年颁发至1976年的75年间，丁肇中是第三位金榜题名的中国血统科学家。当他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之前，需要书写一份言简意赅的答词。他仔细地翻阅有关的资料，在以往的获奖者的答词中，竟没有一份是用中文书写的，这令他心情很不平静。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宣布要用中文来书写自己的答词。他的决定立即遭到来自各方面的非议。首先是一位美国官员出来反对，他认为丁肇中已经加入美国国籍，即是美国公民，理应用英文书写答词。丁肇中反驳说，我虽然加入美国籍成了美国公民，但我领奖是在瑞典而不是在美国，因此用什么文字书写是我的自由。美国官员的劝说无效后，瑞典的有关人士又给丁肇中出了个难题，他们以没有中文打字机为理由，表示无法为丁肇中的中文答词效劳。丁肇中笑着答道，我可以用手写，然后请你们代为复印。丁肇中如此坚定的信念令人感动，再也没有人敢出来刁难他了。

1976年12月10日是个令人难忘的日子。一头黑发、身材魁梧，年仅40岁的丁肇中自豪地坐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大厅里。按惯例，坐在领奖者身后的一般都是妻子。但丁肇中却坚持要父亲坐在身后，而让妻子和心爱的女儿坐在台下。这样的安排，不仅是由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更主要是丁肇中为了表示对父母的感恩，正是在动乱年代父母对他的抚育，才奠定了他日后学

业的坚实根基。当轮到丁肇中致谢词时，这位风度翩翩的学者从容地走向讲台，用中文娓娓动听地发表演说：

得到诺贝尔奖，是一个科学家最大的荣誉。我是在旧中国长大的，因此想借这个机会向发展中国家的青年们强调实验工作的重要性。

中国有句古话：“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种落后的思想，对发展中国家的青年们有很大的害处。由于这种思想，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学生们都倾向于理论的研究，而避免实验工作。

事实上，自然科学理论不能脱离实验的基础，特别是，物理学是从实验产生的。

我希望由于我这次得奖，能够唤起发展中国家的学生们的兴趣，从而注意实验工作的重要性。

这份洗练、独特，用中文书写的答词终于载入诺贝尔奖的史册上，同时也向全世界宣布：使用象形文字的炎黄子孙决不是一个低能的民族！

胶子是否存在？

“工作就是我的兴趣，兴趣使我不会疲倦。”巨大荣誉的赢得使这位以物理实验为第一生命的科学家又开始更为重要的研究工作——寻找新的粒子。

1978年初春，丁肇中风尘仆仆来到德国的汉堡，领导一个来自七个国家，有五十多位优秀科学家的实验小组，从事一项十分重大的实验。这个小组里也有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派出的研究人员。丁肇中无微不至地关照他们的生活，帮助他们很快通过了语言关，召集会议指导他们制订研究计划，使他们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学过物理学的人都知道，原子核是由质子和中子组成，而质子、中子又是由层子组成的。70年代初，便有科学家预言，层子之间很强的相互作用力，是通过胶子的新粒子传递的，它们像胶水一样，将层子与层子“粘连”在一起。这种理论上的假设是否符合客观实际？

丁肇中他们就是为了解开这一悬而未决的难题而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实验，到该年11月份，这个实验小组获得了大量的数据，并对不同能量范围内的446个有关事例进行分析，终于首次找到了胶子存在的实验证据。这一非凡的发现再次轰动了国际物理界。然而又有谁能说的清，这位华裔科学家为此付出了何等巨大的心血啊！

丁肇中在崎岖的科学道路上正从一个高峰攀上又一个高峰。有人曾问过他：“你早就获得了诺贝尔奖，已经功成名就，何苦这样不辞辛苦地日夜奋斗不息呢？”他回答说：“关于这个问题，十年以后再回答你！”

人们正期待着他满意的答案。

在1994年6月8日中国科学院第七次院士大会上，丁肇中被选举为中国科学院首批14名外籍院士之一。

震惊世界的巨星——杨振宁

在人类的科学发展史上，1956年是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年度。这一年，被称为“二十年来物理学上一项最重要的发现——长期普遍被人们接受的‘无可否认’的自然规律——宇称守恒定律被推翻了。”这一震惊世界的贡献，是由两位年轻的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和李政道共同完成的。翌年，他们荣获了诺贝尔物理奖。从此，这两个光辉的名字将与科学史上的巨人牛顿、爱迪生等永远驰名全球。

这里介绍杨振宁的成功之路。

立志

1922年9月22日，一个婴儿呱呱降生在安徽省合肥市一户杨姓的家中。满月时，父亲杨武之为孩子起名“振宁”，其用意不过是为了纪念自己曾在安庆（旧名怀宁）度过的教书生涯而已。岂能料到，34年后，杨振宁竟然取得了声震物理学界的丰功伟业。

杨振宁还是10个月婴儿时，父亲便远渡重洋到美国留学。从4岁起，母亲便严格地教儿子认字，写字。有一回，杨振宁心不在焉，不仅把字写的歪三倒四，还有错字，母亲立刻罚他重写，直到满意为止。每晚临睡前，母亲便给他讲古人发奋读书的故事，来教育和启发儿子做人的道理。母亲更是强调以“三立”——立德、立功、立言，尤其以立德为首要的道理，时时告诫儿子要做一个于国于民有益的、品格高尚的人，不能以升官发财为目标。杨振宁读了《本杰明·富兰克林传记》后，深受教益，立志以这位伟人为榜样，刻苦学习，奋发上进。

杨振宁的父亲在美国获得数学博士返回祖国，首次见到儿子时，第一句问话便是：“你读过书吗？”杨振宁没有回答，只是胆怯地点点头。

父亲微笑着又说：“那你背一段给我听听。”

在母亲的暗示下，6岁的儿子居然能把今天初中生也未必能读通的《龙文鞭影》滔滔不绝的背了下去。

父亲自然又惊又喜，忙把儿子抱起，并从上衣兜里取下一支钢笔奖赏给他。

杨振宁随着父母在北平住了8年，卢沟桥事变的炮声中断了他高中的学业。他们全家经过长途跋涉的逃难，终于到达昆明。

抗战期间，北大、清华、南开等校迁到昆明后，合办了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秋，只读过高二课程的杨振宁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联大，开始谱写他的大学春秋。

当时的学习条件异常艰苦，被同学们戏称为冬凉夏暖的教室，其屋顶是用铁皮做的，窗户是用纸糊的，地面是土填的。宿舍里摆放着20张上下铺位的双层床，40个人住在一起，拥挤不堪。尽管学校物质方面很艰苦，但在知识方面，学校拥有一支阵容十分强大的教师队伍。杨振宁得以从师朱自清、闻一多、罗常培、王力教授学国文；跟赵忠尧学物理；跟吴有训学电磁学；跟周培源学力学。而对他一生的研究事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教授有两位：吴大猷和王竹溪。

1941年秋，即将毕业的杨振宁为了撰写学士论文，便到吴大猷宿舍登门

求教：“吴老师，您看我准备什么选题好呢？”

这位在美国取得物理学博士学位的教授慧眼识英才，他随手从书架取出一本有关分子光谱学和群论关系的书交给对方：“你先看看这个吧，有什么心得再来找我。”杨振宁被这位分子物理学专家引进到物理学的一个新领域。

翌年，杨振宁毕业后，又进该校的研究院攻读。他的硕士论文导师便是王竹溪。每当自己的高材生上门求教时，这位在科学上涉猎很广，在古典物理学和古典数学上造诣极深的英国剑桥大学的博士，总是毫无保留地把自己一本本厚厚的，又书写得十分工整的笔记给杨振宁看，使杨振宁吸取了丰富的营养。

正是这两位教授的悉心指引，杨振宁以后几十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称性”和统计力学这两个方面，并取得了令世人震惊的辉煌成果。

攀登

大学期间，杨振宁心目中有三位最崇拜的大物理学家：创立相对论的爱因斯坦、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狄拉克和主持世界第一座原子反应堆的物理学家费米。1945年秋，23岁的杨振宁在取得清华大学的留学奖学金后，登程赴美深造。

这一年，爱因斯坦即将退休，狄拉克是英国物理学家，不收研究生。所以，杨振宁到美国的最大愿望是能在费米的指导下学习物理。初到美国时，由于费米正在试验原子弹，所以找不到他的下落。后来，由于一个偶然的机遇，杨振宁获悉费米要到芝加哥大学主持一项研究，便费了不少周折才办好申请入学的手续，实现了投奔费米教授门下的宿愿。他们经常在一起探讨学问，情谊十分深厚。教授十分赏识这个中国青年，于是便推荐他到被称为“氢弹之父”的泰勒教授处学习。并郑重地向人们介绍说：“杨振宁是当今最杰出的科学家，他跟中国古代学者不求闻达的态度完全一样。能够结识他，深以为荣。若说他是我的学生，诚愧不敢当。当我们在一起共同研究学术时，我经常意识到他是一位悟性极高、确能举一反三的科学家。在普林斯顿近代物理研究院的许多专家中，我最赏识杨振宁博士那种不怕难、在解决问题时那种坚定持重和沉静态度。这乃是从事科学研究的青年人应当学习的。”

杨振宁的各门功课都很好，然而在做实验时却显得笨手笨脚。还在读小学时，他的手工就做得不大成功。有一天，当他用泥巴捏了一只鸡，高兴兴地拿回家时，“爸爸、妈妈，你们看看我做得手工。”结果家人对他的评语是：这只鸡很像一头牛。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有的人善于用脑，有的人擅长用手。杨振宁尽管在理论上有着超人的能力，但操作能力却不算高明。由于在物理实验中战绩不佳，所以，同学们常开玩笑地说：“凡是有爆炸的地方就一定有杨振宁。”正当杨振宁为他的实验报告发愁时，泰勒笑眯眯地走过来对他说：“杨，你不必再做实验了，你过去写的两篇论文很有见地，我看你就潜心写你的论文吧，我来当你的导师。”导师的这番劝说令杨振宁感到泄气，因为中国的实验物理太薄弱了，他留美的意愿就是希望在这方面有所建树。不过，导师的忠告也颇有道理。经过两天认真的思考，杨振宁终于接受了这位恩师的劝告。

1948年，杨振宁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的学位，由于泰勒的指点，杨振宁结束了实验物理的生涯，确立了粒子物理的研究方向。

成就

1949年，杨振宁来到美国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工作。从此，他在美国物理学界像一颗新星升了起来，他在这里工作的17年，可以说是他最光辉灿烂的时期。爱因斯坦当时虽然已经退休，但杨振宁竟然幸运地与他进行过谈话。爱因斯坦对杨振宁十分赞赏。后来，每当爱因斯坦与学生们讨论到基本粒子科学的问题时，常常笑着说：“让那位姓杨的小博士也来动动脑筋，他的想法有时要比你我高明得多。”

杨振宁发表了《杨氏角分布定理》后，又同费米一起提出了基本粒子的结构模型，用以解释介子的性质，被称为费米——杨模型，为以后的坂田模型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杨振宁迄今在物理学界最卓越的贡献，是他提出了规范场理论和发现了宇称不守恒原理。由于后者，他和李政道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但物理界也一致认为，由于前者，他也应该再得一次诺贝尔奖。

关于规范场的想法，杨振宁在做研究生时就产生过，曾反复尝试、推广，但未获成功。1954年，他到了国立实验室。那时候，新的粒子发现非常之多，他更觉得要有一个各种粒子相互作用的基本原则，于是与他的助手米尔斯一起提出了规范场理论，又称杨——米规范场。这个被誉为20世纪内除了相对论以外最重要的物理理论，解决了爱因斯坦后期30年没有解决的难题。因而科学界认为此理论可以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相比，称赞杨振宁是“爱因斯坦之后最有贡献的物理学家。”

杨振宁是如何发现宇称不守恒的原理呢？

原来，物理学中有一些基本的定律，如质量守恒定律，能量守恒定律等等。这些定律，一般都被认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人们只有遵循、利用的权利，而不能有任何怀疑的念头。在微观世界里，就有一条几十年来一直被人们公认为千真万确的法则——“宇称守恒定律”。简单的说，“宇称守恒定律”就是微观粒子体系的运动或变化规律具有左右对称性。但是，到了50年代中期，人们在研究基本粒子时发现了一些新的现象，是这条定律无法解释的。于是从1956年起，杨振宁和他的挚友李政道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华人饭店用餐时，经常争论这一问题，并大胆地提出了新的想法。他们的设想是：在强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定律成立，但在弱相互作用中它可能受到破坏。他们从数学上计算了这种可能性以后，便邀请了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的自己同胞吴健雄博士来担任这一实验工作。

实验成功了！1956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共同发表了论文，推翻了物理学界被奉为经典的“宇称守恒定律”，提出了“宇称不守恒定律”。这一发现顿时轰动了整个世界，美国最有影响的《纽约时报》发表社论说，“至少已找到了一条走出当前宇宙丛林的途径。”

荣誉

1957年，杨振宁偕夫人杜致礼到瑞典的斯德哥尔摩领奖。诺贝尔奖是很崇高的荣誉，它从1901年开始颁发，每年都要评选获奖的人，举行隆重仪式，颁发奖状、奖章和奖金。这一年照例举行庄严、肃穆的颁奖仪式，台上端放

着诺贝尔的雕像。瑞典国王亲自出席，诺贝尔皇族的后裔在主席台的右侧就座，当年获奖者在左侧就座。先由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介绍获奖人的成就和贡献，然后由国王亲自授奖。

当杨振宁站在这个令世人瞩目的颁奖大厅里发表答词时，他是这样说的：“首先，请准许我为内子和我所享受到的优渥款待，向诺贝尔基金会和瑞典科学院表示感谢。我也想特别向卡尔格仁教授致谢，因为他作了引述，并且引用了一段中文，听到中文令我倍感亲切。”“我今天站在此地向各位谈这些事的时候，我深深地觉察到一桩事实，这就是说：从广义讲，我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产物。”这话的含义说明杨振宁始终不忘自己是炎黄子孙，自幼接受了中国的教育，青年时代又开始接受了西方先进科技的教育，是这两方面的教育造就培养了他。

杨振宁获奖之后，又得到了更多的荣誉。美国的纽约州立大学，特别邀请他前往该校任教，以便将该校办成研究气氛非常浓厚的大学。1966年，杨振宁受聘为爱因斯坦讲座教授，兼物理研究所所长；1974年，尼克松总统亲自提名杨振宁为林肯讲座教授，这在美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每年只颁给三位最卓越的学者。此外，杨振宁还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经常到美国及世界各地讲学，参加学术活动，传播科学真理……1986年，他又荣获美国总统里根授予的国家科学技术奖。

祝愿

杨振宁念念不忘自己的故国。

1971年7月下旬，在十年动乱的时刻，杨振宁回到阔别了26年的家园。8月4日下午，当杨振宁踏上人民大会堂的台阶，环顾四周时，真是感慨万千。这个城市对于他来说，既熟悉又陌生，所谓熟悉，因为他青少年时代曾在这里生活过8年；所谓陌生，是由于这里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变。人民大会堂会见大厅的地板上铺着一层厚厚的红地毯，73岁高龄的周总理虽然显得有些苍老、消瘦，但风度翩翩，双目炯炯有神地会见杨振宁夫妇。这次会见和宴请，周总理前后与杨振宁足足谈了8个小时。他对美国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感兴趣，而且知道得十分详尽，以至杨振宁以为总理的头脑是一部十分精密的电子计算机。使杨振宁特别难忘的是周总理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杨博士在海外的成就说明了中国人并不比别人笨，中国目前在许多方面还很落后，但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迎头赶上去。”会见临近结束时，周总理亲切地说：“我希望杨博士和许多有识之士一道，在中美两国人民之间架设一座交流科学，增进友谊的桥梁……”

杨振宁这次回国，拉开了中美学者之间重新交往的序幕，在中美科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此以后，杨振宁几乎每年都要到中国大陆来探亲、访问、讲学，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他对祖国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提出过许多重要的建设性意见，并选拔了许多优秀的中国青年到自己身边培养和训练。他充满信心地表示：“中国有成千上万有才能的人，把他们的能力发挥出来，就将使中国在21世纪对世界文明作出不可估量的贡献。”北京大学授予杨振宁博士名誉教授的荣誉；在1994年6月8日中国科学院第七次院士大会上，他被选举为中国科学院首批14名外籍院士之一。

1978年，杨振宁来华探亲后，飞越西藏高原时，在飞机上曾作过一首题为《空间与时间》的诗：

玲珑晶莹态万千，雪铸峻岭冰刻川。
皑皑逼目无边际，深邃凝静亿万年。
尘环动荡二百代，云水风雷变幻急。
若问那山未来事，物竞天存争朝夕。

这豪迈的诗句抒发了作者对中华民族的崇敬心情，歌颂了中国人民只争朝夕建设现代化强国的精神表达了他对故家园的良好祝愿。

念念不忘故国的科学家——李政道

1957年，当李政道与杨振宁前往瑞典领取诺贝尔奖金后，有关当局举办了一个盛大宴会。席间，李政道被推举到台上发表演讲。面对着与会的瑞典各大学学生和社会名流，这位年轻的获奖者通过一个生动而形象的故事阐述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他风趣地说道：“在寻找知识的过程中，好像孙行者一个筋斗翻了十万八千里一样，可能取得飞快的发展，即使我们翻到如来佛的手指根上，我们离真理还是很远的。”这位学贯中西的年轻学者的演说博得了人们热烈的掌声。

本文就介绍这位当今杰出的物理学家是如何在知识和科学的海洋中不停地翻筋斗的。

“重要的是人，不是条件”

1926年11月25日，李政道降生在上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兄妹六人，他排行第三。他的父亲虽然经商致富，然而对儿女的管教十分严格。为了儿女学业的长进，他专门请了家庭教师；为了他们能有健康的体魄，还请过武术教练。由于家庭的熏陶，他从小就格外喜爱数学和物理学，从小学到中学，他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抗日战争爆发，日寇占领上海后，李政道随着两个哥哥流落到江西读书。上高三时，由于师资缺乏，学校聘请不到数学和物理学教员，就让李政道给同学们代课，他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他认真备课，遇到疑难问题就向哥哥请教，他的讲解深入浅出，竟收到很好的效果。这段“小先生”的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促使他更加勤奋学习。

1943年，李政道考入迁到贵州遵义的国立浙江大学。当时物质条件很差，物理实验室就设在破庙里，教室和宿舍挤在会馆里，连个看书的地方都找不到。他每天只好跑到茶馆去，买一杯茶整天坐在角落里看书。这种读书方法，练就了他闹中求静的顽强的抗干扰能力。一年后，他转入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当时，杨振宁也在这里读书，但是他们未曾见过面。这里的学习条件也很艰苦，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小茅草屋里，臭虫成群，无法入眠。李政道还是老办法，每天跑到茶馆去看书。后来，当他回忆起这段生活时说道：“就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还造就了许多人，数学、物理、化学界都有。杨振宁、朱光亚、唐敖东和我，都是那个时候培养出来的，看来最重要的是人，不是条件。”

友谊从猜字谜开始

1946年，李政道还不满20岁，大学也没毕业，经过导师吴大猷教授力排众议，这个“乳臭未干”的年轻人获得一等奖学金赴美深造去了。吴大猷给美国一位教授的推荐信中介绍说：“李政道在中国的大学只读了两年，但他是一位聪明有为的青年，思想有条理，头脑精密，勤奋好学，他的学业比大学毕业生并不逊色。我相信他如果得到适当的指导，一定会成为一位优秀的物理学家。”但在学制森严的美国，李政道遇到了许多挫折，最后，他来到芝加哥大学才得以注册入学。

1950年，李政道获得这所大学的博士学位后，便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担任副研究员和讲师。1951年进入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从事研究。1953年当他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时，该院院长奥本海默郑重地表示：“我们怀着极其惋惜的心情看着他离开。他是我们所知的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他在统计力学以及原子核和亚原子核物理学上的造诣闻名于全世界，而且的确是名不虚传的。他解决了一些长期未能解决的难题。他的工作表现出创造性、多面性和独特的风格。”

1954年，李政道曾提出一个假想的量子场论模型，后来被称为李氏模型。这一模型与实际的中子、质子和派子有点相似。这是量子场论中极少有的可以完全解出的模型之一，因而深受欢迎。物理学权威人士对李氏模型作过深入研究，肯定了它的价值与意义。

李政道在芝加哥大学就读期间，杨振宁也在这里攻读物理学博士，两个吴大猷教授的高足越过千山万水终于在异国他乡相遇，同时都在原子弹之父——费米的指导下，开始密切合作。他俩经常在大学附近的一家华人饭店会面，美餐之后，一边喝茶一边讨论，每次都交谈很长的时间，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以致旁观者以为他们是在闹别扭。

有一天，芝加哥的一家报纸登出举办字谜比赛的消息，这是一种和砌字相仿的游戏，头等奖可以获得五万美元的奖赏。许多青年茶余饭后都谈论这件事，简直着了魔。李政道和杨振宁自然也被卷了进去，他们在紧张学习之余能有这样的兴致，与其说是盼得奖，不如说是做一遍大脑体操。他俩发现比赛规程上有一处模糊不清，于是便做出两套答案寄去。几天后，他们收到答复，主持人对他们的才华并不欣赏，竟借口他们的答案过多而予以否决。这样不公正的答复虽然使两位年轻人感到失望，但他们却发现彼此志趣相同，在抽象思维方面有许多共同语言，他们之间的友谊更加深厚了。

震惊世界的新理论

物理定律经常显示左右之间的完全对称。这类对称在量子力学中可以简单陈述为守恒定律，即空间反转和宇称的守恒性，这是与左右对称原理完全相当的一项守恒定律。1956年夏天，这两位年轻的物理学家共同进行原子核和基本粒子的研究，他们经过一番分析和计算之后，大胆地提出了一种新理论，即“宇称守恒定律”并非普遍真理，它只有在强相互作用和电磁相互作用下才是正确的，而在原子核和基本粒子之间，以及基本粒子之间的弱相互作用下则是不适用的。宇称守恒被推翻，对于基本粒子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粒子物理学研究的一个转折点，开辟了人类对亚原子复杂性认识的新前景，使得基本粒子物理学领域中产生了很多新的重要研究课题。所以，“宇称不守恒定律”的发表，震惊整个世界。美国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拉比教授评论道：“就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相当完整的理论结构从根本上被摧垮了，我们不能肯定这些碎片将怎样再组合在一起。”

当李政道、杨振宁提出的假说得到实验证实后，他们二人于1957年4月共同获得爱因斯坦物理学奖。同年年底，瑞典皇家科学院就破例授予他们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获得这样高的奖赏。当时，李政道年仅31岁，在历次诺贝尔奖获得者中，他是第二位最年轻的。1958年，李政道、杨振宁和吴健雄三人又同时获得普林斯顿大学荣誉博士的称号。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戈英在授予李政道博士学位证书时曾宣称：“这位青年学者的

辉煌成就，证明人类高度智慧阶层中，东方人和西方人具有完全相同的创造能力。”

拳拳赤子心

李政道对中国的科技事业和“四化”建设非常关切，曾多次向中国的领导人出谋献策。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就是根据他的建议于1978年3月创办的。他为培养理科超常少年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李政道曾多次回国讲学，为了把课讲好，他每天凌晨三、四点钟起床备课，嗓子讲哑了，人也瘦了都顾不上休息。他专程看望少年班的师生，从当前物理研究最新成果谈到治学的态度和方法，告诫他们要扩大知识面，重视物理实验，敢于提出新见解，并深情地提笔写下了“青出于蓝，后继有人”的题词。他还多次选派中国留学生赴美深造，为了能使更多有才华的中国青年到美国学习，他亲自出面改革了手续繁复的美国招生制度，推行新的制度。一批批中国留学生到了美国后，从学习到生活，他都关怀备至。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回答说：“中国送来的孩子，我有责任负责到底！”

李政道对中国留学生不仅关怀备至，要求也格外严格。1986年11月25日，是李政道教授60寿辰，也是他和杨振宁博士推翻宇称守恒定律30周年。纽约地区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的120多名留学生举行学术讨论会以示庆贺，当李政道讲话时，坐在后排的个别学生不认真听讲，交头接耳。李政道顿时严肃起来，声色俱厉，会场立时鸦雀无声。李政道说：“今天我在讲演的时候，后面还有人讲话，这是我到全世界各地去演讲的时候没有遇到过的，即使听众一千人，都没有这种情况，都在注意听。昨天，全世界、全美国二百多位物理学界有成就的人都来了。为什么他们都尊重我呢？你要自己尊重自己……你们对得起自己吗？你们对得起下一代吗？你们对得起上一代吗？你们必须努力。两百年来，中国人是受压的，黄帝的子孙是要抬头的。你们是精华，你们必须尊重自己，你们必须向前看，你们必须告诉自己，你们是优秀的，你们是要负责任的。”他后来还表示，由于“爱之深，所以话说得尖锐了一些。”主持会议的学生请他给同学们题词，他当场写了“自尊向上，不进则退”八个大字。

这些年，李政道每年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用在帮助中国发展高能物理和人才培养方面，这位蜚声国际的著名物理学家说：“只要能给中国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才，我个人作些牺牲是值得的。”他的奉献精神已经在中国大地结出硕果。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怀这位引为自豪的炎黄子孙。

1994年6月8日，中国科学院第七次院士大会上，李政道被选举为中国科学院首批14名外籍院士之一。

国际物理学界的女皇——吴健雄

你听过郑和七次下西洋的故事吗？当年郑和下西洋的出发港是在长江的入海处，即江苏太仓县浏河镇。在 20 世纪初，这个屹立在海浪咆哮声中的河港，诞生了一个不平凡的孩子——吴健雄。这个名字太有力量了，后来她成为著名的科学家，做出的杰出贡献震惊了国际物理学界。

校园里的佼佼者

郑和下西洋扬帆启航的浏河镇，随着时间的流逝已失去昔日的光彩，但那些充满浪漫色彩的传奇故事却经久不衰。吴健雄于 1912 年 5 月 31 日降生在这块广为传颂着先辈英雄业绩的土地上，童年时代接受的英雄主义精神的熏陶，使她深深地懂得一个道理：中国人绝不比外国人笨，这便是她人生的第一课。

吴健雄的父亲早年曾参加过讨伐袁世凯的斗争，后来回乡与夫人一道提倡男女平等，创办了明德女子职业补习学校。这对夫妇有二子一女，都起了响亮的名字，这里寄托着父母的殷切期望：不论男女，都应当成为英雄豪杰。

1923 年，吴健雄考入设在苏州的江苏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该校师资相当雄厚，但讲授的只有文科课程。吴健雄自小十分用功，门门功课都优秀，作文也写得好，有一次竟得到这样的评语：“眼高于顶，笔大如椽”。吴健雄颇感到得意地将作文拿到父亲面前显示一番，父亲阅后不仅没有夸奖，反而谆谆告诫她“学无止境”和“要想成功就得有恒心”的深刻道理。这些教诲令她铭记终生。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她始终坚持一丝不苟、孜孜以求的精神。

吴健雄更感兴趣的是数学和物理。为了满足女儿求知的欲望，母亲专程赶到上海，跑遍了大小书店，采购了一套物理、化学、代数、几何的教科书和参考资料。从此，吴健雄便依靠这些书，经过几年的刻苦钻研，竟无师自通地在理科学科中也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29 年秋，吴健雄考入国立中央大学数学系，一年后又转入物理系就读。五年的大学时间，吴健雄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学习上。每次上大课前，她总是早早地带上图书和笔记本来到教室，坐在前排中间的位置上，先复习已学过的知识或是预习未上的课程，决不浪费分秒光阴。久而久之，这前排中间的位子竟成了她的专座。1934 年，22 岁的吴健雄以毕业考试总平均分数为 86.3 分的优异成绩获得理科学士学位，圆满地结束了自己的大学春秋。她的成绩是当时全校各系 470 名毕业生中名列前茅的佼佼者。当有人问及她的学习秘诀时，她只是笑笑答道：“我只是把别人花在闲谈、跳舞和约会的时间都用在学上罢了。”

成就与荣誉

1936 年，吴健雄前往美国深造。她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拜诺贝尔奖获得者劳伦斯教授为师，学习原子物理理论。1940 年她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随即在该校史密斯研究院、普林斯顿大学等处执教多年，培养了大批物理人才。到了 1943 年，她已是才华出众的科学家。次年，她被应

召去哥伦比亚大学战争研究部参加曼哈顿工程，这是众所周知的生产原子弹的计划。她在那里专门从事辐射探测研究，出色地完成了许多研究课题。1958年，她被哥伦比亚大学聘为该校的教授。同年，吴健雄被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还颁发给她“科学研究基金奖”。1962年，她被授予美国大学妇女协会年度杰出妇女奖，1964年获美国全国科学院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吴健雄于1972年荣获哥伦比亚大学特设的“普佑平物理学教授”的荣誉称号，这是该校最高教授职位。在美国，普佑平是位家喻户晓的科学家。19世纪末，当这个十几岁的苦孩子到达美国时，连英语都不懂，但他以惊人的毅力克服了重重困难，在电机、电讯方面造诣很深，成为世界著名的发明家。为了纪念这位近代物理学的先驱者而设立的这项最高荣誉，奖给吴健雄是当之无愧的。1974年，吴健雄被美国科学界授予“最优秀科学家”的称号，她是获得此项殊荣的第一位女性。次年，在强手如林的美国物理学界，吴健雄被一致拥戴当选为美国物理学会的第一任女会长，这在美国也是破天荒的事情。1986年，美国总统里根给12名美国著名人士颁发了杰出移民证书，以表彰他们对美国作出的卓越贡献，吴健雄博士便是其中的一人。

几十年间，吴健雄与实验室结下不解之缘。这位被诺贝尔奖获得者赛格里博士称之为“当代核物理领域中专制的女皇”的卓越科学家，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写出了一份份有真知灼见的实验报告和其他论著，显示了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聪明才智。

幕后英雄

1956年，对于国际物理学界来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这年，两位年轻的科学家杨振宁和李政道首次提出了电子的弱性相互作用“宇称不守恒的理论”，推翻了几十年来被人们捧为金科玉律的“宇称守恒定律”，顿时引起了轰动。支持者认为，两位年轻学者能够透过层层迷雾，抓住了事物的本质，提出了新的理论；反对者则认为年轻人太“狂妄”，因为“宇称守恒定律”是爱因斯坦提出来的，要推翻它需要经过实验的证明。

当时，在哥伦比亚任教的吴健雄正准备到日内瓦和远东巡回讲学。当她接受了杨振宁、李政道两人的邀请，担任实验工作后，毅然取消了讲学计划，立即来到华盛顿国家标准局。她要求美国国家标准低温物理委员会和原子能委员会协助，与几位著名的放射学专家一起，开始了在现代物理学方面意义重大但又极其复杂的实验工作。

吴健雄的方法是观察钴60射出的 β 粒子。把钴60放进一个强大磁场，将原子排成一个方向，让它超冷，使无规则的热运动减到最小限度，然后再观察它的电子散布在什么地方。这是一项高难度的实验，涉及到复杂的因素和严格的超低温条件。时值隆冬季节，吴健雄几乎整天都在实验室操作，饿了啃干面包，渴了喝杯热牛奶，每天仅有四个小时的睡眠。紧张又繁重的实验使吴健雄消瘦下去，但她内心却日益充实起来。

半年的时间过去了，功夫不负苦心人，吴健雄经过反复的实验，终于赢得了丰硕的成果。她果真发现：钴60放射出来的数以万计的电子大多数主要射向一个目标，即和每个原子核旋转的方向相反，它说明了这样的事实：在弱相互作用下宇称守恒定律并不是完全正确的，而宇称不守恒的定律才是正

确的。1957年1月4日，当吴健雄将令人信服的实验报告——即对宇称守恒定律不适用于亚原子粒子间的弱相互作用提供的第一个证据公布后，顿时轰动了国际物理界。有人称道，吴健雄解开了原子和核物理方面的第一号谜底。

1957年，吴健雄与杨振宁、李政道同时提名为该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奖候选人，但最后得到嘉奖的并没有这位幕后英雄。在一片不平的议论声中，吴健雄并不计较得奖与否，她认为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一种快乐，在艰苦的劳动之后能得到成果，这就是最高奖赏。她的导师劳伦斯曾经这样评价自己的学生：“她研究起来，不顾一切，真是当代核子物理的女皇。”

故国情怀

1936年，当吴健雄赴美留学时，曾在故乡的《太仓明报》上发表过一篇充满激情的告别辞，透露出这位风华正茂女性的赤诚之心：学成之后必回国效力。多少年来，这位海外赤子无时无刻不惦念着故国家园。

中美建交后，吴健雄热忱地接待过许多中国的访问学者，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与帮助。

从1973年起，吴健雄便和丈夫——美国物理学家袁家骝博士多次回国探亲、讲学，受到敬爱的周总理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待。

1982年初夏，吴健雄夫妇再次踏上访华的旅途，在短短的一个半月里，70高龄的吴健雄不辞辛苦，脚穿一双中式白底布鞋，身着一件中国江南一带妇女喜欢穿的旗袍式连衣裙，从华东、华中、华北直到西南，行程万里，许多高等学府和科研机关都留下了这位世界“物理女皇”的足迹。

是年7月12日，吴健雄回到了浏河镇。几十年过去了，旧貌换新颜，家乡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吴健雄重游了故居之后，重点参观了明德学校。这既是她父母创办的学校，更是她受启蒙教育的学堂。学校的轮廓基本依旧，但增添了校舍，学生也多了，充满了生气。为了修建少年儿童娱乐室，吴健雄决定将旧居房款25000元献给这所学校。临别时，应全校师生的盛情邀请，吴健雄欣然提笔写下了“明德学校”四个雄健飘逸的大字。这四个字饱含着她对故园的思恋之情。这位饮誉世界的女科学家深信，在这片称之为龙的故乡的沃土里，一定会培育出更多的科学家。

这些年来，吴健雄相继被聘为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和北京大学等校的名誉教授。在1994年6月8日中国科学院第七次院士大会上，吴健雄被选举为中国科学院首批14名外籍院士之一。

解开卡拉比猜想——丘成桐

诺贝尔奖是早已被世人公认的最高荣誉。但是，菲尔兹奖，这项与诺贝尔物理奖、化学奖相比绝不逊色，被人们公认为国际数学界至高无上荣誉的奖项却为大家知之甚少。自设立 40 多年来，菲尔兹奖每四年颁发一次，其评选条件十分严格。规定中要求，获奖者不仅在当代数学界有卓越成就，且年龄不得超过 40 岁。丘成桐便是获得此项大奖的第一位华人科学家。

在困境中成长

1949 年 4 月 10 日，呱呱坠地的丘成桐出生在广东省汕头市。还不足一百天，他便随父母离开家乡迁居香港。当年的香港，经济萧条，社会动乱。丘成桐一家九口仅仅靠父亲的工资维持生活，日子自然过得十分清苦。

丘成桐的父亲是一位品格高尚的研究哲学的知识分子，由于洁身自好，竟遭人排挤。他愤然辞职，不久忧郁死去，此时，丘成桐才 13 岁。他有兄弟姐妹七人，父亲不幸早逝，全家八口的重担便落在母亲身上。母亲四处奔波竟找不到一份工作，只能靠打毛衣，挣几个血泪钱养家 口。看到母亲的辛劳，小小年纪的丘成桐便懂得了人间的辛酸。

幸好有丘成桐父亲的几个学生的介绍，他的三姐在社会上觅得一个职位，才勉强维持一家的开销。善良的三姐为了全家人的生计，更为了弟弟的学业和成就，辛劳一生，以致牺牲了个人的幸福，没有成家。

十几年后，当这位年轻的数学家已蜚声国际数学界，人们问及他的感受时，丘成桐竟声泪俱下地说出这番话：“没有父母就没有我的今天。三姐为了我们的家庭作出了很大的牺牲，这些我永志不忘。我今天的成就，与父母的抚育和三姐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幸遇伯乐

早年丧父，母亲守寡，家境贫寒，生活艰苦，更激发了丘成桐在逆境中勤奋学习。在香港读中学时，有位学识渊博，教学有方的王老师曾问他：“你最喜欢什么课？”丘成桐不好意思地回答：“数学。”老师又问：“那你最崇拜谁？”“祖冲之、高斯。”王老师十分高兴，把许多涉及数学的书籍借给他看。正是由于王老师的引导，丘成桐开始在数学的汪洋中扬帆远航。

升入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数学系后，丘成桐仅用两年时间便自学完四年的课程，正当他无课可上时，热心的沙拉夫教授写信给美国伯克莱加州大学的著名数学家陈省身教授，向他推荐这位年仅 20 岁的聪慧的大学生。

年近花甲的陈教授十分重视这封来信，第二天便亲自向学校当局推荐丘成桐，主管人士竟以丘成桐没有大学毕业文凭为由加以拒绝。陈教授不灰心，仍以极大热情四处活动，终于迫使学校破格录取了这位有真才实学的青年，还为他争取到一笔奖学金。

丘成桐来到伯克莱加州大学，只学了一年便当上了陈省身的研究生。站在前辈大师的肩膀上，丘成桐在数学研究的领域里开始了辛勤的耕耘。

大学期间，丘成桐被同学们赞美为是一个“全面出击的人”。他如饥似渴地发愤读书，凡是涉及数学的讲座，他每场必到。兼收并蓄使他的知识领

域十分广博。丘成桐除了研究几何学本身的问题外，也用几何方法解决广义相对论和拓扑学上的难题，而且多有建树。

两年后，年仅 22 岁的丘成桐便取得了博士学位，并发表了论文《基本群与曲率》引起了同行的关注。毕业后，他先后到普林斯顿和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工作过，后来成了斯坦福大学和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的终生教授。尤其是后者，在国际上颇负盛名，“终生教授”仅有数人。

丘成桐在数学上的研究是多方面的：微分几何、非线性椭圆微分方程、低维流型拓扑，广义相对论，复流型解释几何等方面都有成就。他解决了广义相对论中的正质量猜想，又与另一位华裔青年数学家肖荫堂合力解决了“任鸿熙猜想”，并给予“弗兰克猜想”充分的证明。而他最突出的成就是在 1977 年，由于解开了“卡拉比猜想”而扬名世界。

卡拉比猜想

什么是猜想？

这是人们对自然规律的一种判断。有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凭借着他们超人的直观能力，提前对错综复杂的自然现象作出判断。由于当时科学发展条件的限制等种种因素，往往本人还来不及对这些判断加以证明便去世了，于是就给后人提出了难题，这一个个难题便是人们常说的猜想。

卡拉比猜想便是这类难题之一，这项有关高度空间曲线的几何理论假设，于 1952 年由著名的美国数学家卡拉比提出来的。他本人没有论证过，以后的 25 年间也一直未能证实。

丘成桐为了攻克卡拉比猜想，经历了长达五年的探索。当他付出巨大的代价还摸索不到成功的途径时，曾经十分苦恼，甚至一度怀疑过这项猜想的正确性。最后，追求真理的信念促使他继续奋斗。当解答进入到关键阶段，丘成桐有两个星期日夜苦思冥想，不停地运算，以至到了入魔境界，茶不思饭不想。功夫不负苦心人，他终于突破了问题的难点，使这项令许多科学家梦寐以求的难题终于得到了完满的证明。丘成桐把微分方程应用到微分几何中去，推动了微分几何和微分方程的发展，因而扬名海外。这一年，他才 28 岁。

短短 10 年的岁月，丘成桐从一名学生成长为一名卓有成就的青年数学家，同时也获得了应有的荣誉：1979 年，美国加州科技及工业博物馆颁发给他“科学家奖”，30 岁的丘成桐成了第一个获得这一荣誉的数学家；1981 年，他获得美国数学家学会的“韦伯伦奖”；1982 年，他更为荣幸地获得相当于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顿时成为举世瞩目的风云人物。

成名之后，丘成桐念念不忘把他引入数学王国的恩师，他更没忘怀中国的科学事业，在繁忙中曾多次应邀到香港和中国大陆来讲学，传授知识和经验。有一次，在北京大学作学术报告时，他谦逊地表示：“我不是什么天才，但我总是不停地想，有的问题我想了 5 年，有的想了 10 年。大家也许能够从从我身上得到一点启示，这就是中国人并不比别人笨。”

在 1994 年 6 月 8 日中国科学院第七次院士大会上，丘成桐被选举为中国科学院首批 14 名外籍院士之一。

饮誉世界的数学大师——陈省身

这里要讲的是杨振宁、丘成桐两位杰出科学家的老师，当代世界著名的数学家，美籍华人陈省身教授的故事。陈教授的学生遍布全世界，除了美国外，中国、日本、巴西和希腊，都有他们的足迹。

多姿多彩的学生时代

在上海与杭州之间，有一座景色秀丽、遍布古迹的江南水乡——浙江省嘉兴县，闻名于世的大运河便从这里穿过。1911年10月26日，陈省身便出生在这座古老的县城里，并在这块沃土上度过自己的童年。在外地做事的父亲虽然难得与家人团聚，对儿子的教育倒是很经心的。陈省身四、五岁时，父亲送给他一套“笔算数学”，并利用茶余饭后教他一些简单的加减乘除。一年以后，陈省身已经能够完全读懂了这套课本。

上了中学，陈省身便体现出对数学的偏爱和天赋，面对着霍尔与奈特合著的《大代数》等教科书，旁人认为枯燥乏味的数学、公式、定理，在他眼前竟变成了趣味横生的乐曲，他如醉如痴地演算了大量练习题。当时的校长和老师已经预感到这位稚气少年具有未可限量的发展前景。

1926年，年仅15岁的陈省身以优异的成绩考上颇有声誉的天津南开大学。他读理科，按常规需先学三年基础课才选修专业课。陈省身只读了一年多便选修了数学课，十分幸运地跟随姜立夫教授学习线性代数、非欧几何和立体几何等课程。

1930年，陈省身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是该院唯一录取的一名数学研究生。他追随对射影微分几何有很深造诣的孙毓教授学习，写出了几篇很有见地的论文。

在清华研究院获得硕士学位之后，1934年，陈省身取得了留学奖学金。他考虑到德国汉堡大学的著名数学家威廉·布拉斯克来讲学时，介绍过威布斯几何，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因此放弃了赴美的机会，而专程到德国寻师。

1934年11月，陈省身进入汉堡大学，1936年2月便获得了博士学位。他与导师商讨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后，陈省身没有继续留在汉堡，走一条成为杰出代数数学家的捷径，而是寻觅更艰苦的科学攀登之险途，到巴黎去找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微分几何学家嘉当，进一步探讨几何学的奥秘。

嘉当的论著深奥难懂，犹如天书一般，陈省身却很快地掌握了这位微分几何权威的思路。一般说来，数学是相当抽象的，每一个概念总要定义的一清二楚。嘉当探讨数学的方法则是直观的，他通常从一些较具体的个别情况出发，而不采用抽象式最一般的观点处理问题。嘉当解答学生问题是定日定时的，就跟名医会诊差不多，每周仅安排一个下午。起初，陈省身也和其他学生一样，都毕恭毕敬地在办公室门外等待接见。经过几次接触深谈后，嘉当高兴地对他说：“你不必再到办公室来等候了，以后每两个星期，你可以到寓所里面谈一次。”这样的厚遇令陈省身欣喜异常，他成了嘉当的入门弟子。说来也巧，陈省身和这位导师同住在一条大街上，每次约谈之后，他仍然有些问题未能解决，怎么办？陈省身便采用书信传递的方式，在两次面谈之间相互交流，这便成了巴黎数学界的一段美谈。

在战火纷飞的旧中国

陈省身留学欧洲学得一身本领，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1937年夏，清华大学聘他为数学教授，他怀着科学救国的壮志，毅然踏上归国的旅途。途中传来“七·七”事变的炮声，轮船无法到达上海，改道香港。当时清华等校已经被迫南迁，他不顾友人劝阻，先赶到长沙，不久又与师生共同长途跋涉到达昆明，参加了西南联大的教学工作。

当时的生活是异常清苦的。物价飞涨，日用品奇缺，即便是著名的教授、学者，一家几口也只能合住一间小屋，课余还得要种菜、养猪，用以贴补生计。必要的图书资料及实验器材都未能运到，教学科研更是困难重重。加上日本飞机经常空袭，师生只能一边疏散，一边坚持上课。

陈省身开设了比较高深的李氏群、保形微分几何等课程，讲课时，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把当时教学界的最新成果传授给自己的学生，培养出杨振宁等一批优秀人才。杨振宁曾在一首《赞陈氏级》的诗中写道：“欧高黎嘉陈”，他认为这位恩师在几何学的地位，是和欧几里得、高斯、黎曼及嘉当等大师是齐名的。

成就与荣誉

陈省身在昆明西南联大执教期间，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的魏伯廉和魏勒教授读到了他的论文，非常赏识他的才能，邀请他前去做研究工作。1943年——1945年，可以说是陈省身数学研究的丰收时期。他先后完成了著名的高斯——逢内公式的本质证明，发展了著名的“陈氏示性类”理论，这些著述令陈省身蜚声国际数学界。他结识了代数拓扑家列夫舍兹，并协助他编辑著名的数学学报《数学年刊》。

1946年4月，应中国科学院邀请，陈省身回到上海，和姜立夫教授一起组建了数学研究所。该所迁往南京后，陈省身选拔了20名刚刚大学毕业的学生，亲自教授他们代数拓扑学，为祖国培养了一批年轻的数学工作者。

1948年底，陈省身全家到美国定居。1960年后，他受聘于美国伯克莱加州大学。

1982年9月，美国国家数学研究所正式成立，陈省身担任第一任所长。由于陈省身对数学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而被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82年底，陈教授接受了爱因斯坦的母校，瑞士联邦工业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1984年5月20日，他又获得了10万美元的国际伍尔夫数学奖。

为新中国科学事业出力

远在国外他乡的陈省身始终不忘故土故人，渴望为中国的数学发展献计献策。自1972年起，他数次来华讲学，先后担任了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校的名誉教授。为了帮助中国培养大批高级数学人才，1980年，他倡导每年在中国举办一届国际性的微分几何和微分方程学术讨论会；1981年起，他又约请国际第一流的数学家分期来华，利用假期给国内的一些研究生授课。他还多方奔走，帮助一批中国数学研究生赴美深造。

对于母校南开大学，陈省身更有特殊的情感。他曾把一万美元和七千册藏书捐献给母校数学研究所。在中国教育部门大力支持和陈省身的热心帮助下，1985年6月，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的新楼建成投入使用，这是我国第一座现代化的数学教学与科研大楼。每年围绕一个数学重点，由陈省身协助聘请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大师来到此处，向全国的优秀研究生和青年教师，系统地讲授当前世界数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帮助中国培养数学的高级人才。陈省身常说：“中国人的能力是不需要讨论的。20年后，中国将会成为世界数学大国之一。”

在1994年6月8日中国科学院第七次院士大会上，陈省身被选举为中国科学院首批14名外籍院士之一。

物理化学界的莫扎特——李远哲

你一定听说过莫扎特这个光辉的名字，他是世界著名的奥地利作曲家，从小学习钢琴，表现出超人的天赋，被世人称颂为“乐圣”。这里所说的物理化学界的莫扎特是荣获诺贝尔化学奖的第四位海外华人——李远哲。这不但因为他是一位早熟的天才，而且因为他同“乐圣”莫扎特一样“准确”。凡修过他课程的中国留学生都交口称赞他那严肃、认真的教学和从事科研的态度。

崇拜的偶像

1936年，李远哲出生在台湾省新竹县一个书香世家，父亲是位水彩画家，也是位美术教员。在兄弟姐妹八人中，他排行第三，全家十口人，全靠父母的薪水维持生活。孩子们从名利淡泊的父母亲身上学到了勤俭朴素、要强的性格，清苦的家境也培养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

由于受家庭的熏陶，李远哲从小酷爱学习。后来他回忆自己的童年时，曾经风趣地讲过：“小时候妈妈常看我做事慢条斯理，担心我将来‘做鬼也抢不到钞票’。”其实李远哲从小就好学多智，兴趣广泛，十分活跃。小学时，他是学校乒乓球和棒球队成员，在全台小学生乒乓球锦标赛中，捧回过冠军奖。中学时，又是管乐队队员，网球选手。大学时，喜欢音乐和体育，还经常向报刊投稿。打棒球的经验竟帮助他产生了能够赢得诺贝尔化学奖的想法。他从小做事就十分认真，有一回，兄弟二人去游泳，回家后，发现饭盒忘带回来。他马上赶回去，走了10多公里，将饭盒取了回来。他像所有人一样，在平凡中成长；但他又与别人有所不同，无论碰到什么困难都不退缩，总是坚持，继续努力，动脑筋、想办法，直到想出新的思路为止。

小学毕业后，李远哲升入新竹中学就读，度过了六个难忘的春秋，由于读书十分用功，初中三年，各科成绩优秀，其中数理化三科均在90分以上，这在全班同学里是出类拔萃的。中学阶段，他最感兴趣的课程是化学，每次做实验，他总是认真操作、细心观察、独立思考，出色的完成。还能经常提出问题，有些问题连老师也回答不上来。

读初中时，李远哲便把30万字的《居里夫人传》细细读过几遍，居里夫人在发现镭之后，为了让这一发现尽快地造福人类，竟不顾自己的生活还十分艰辛，断然拒绝申请专利，并且立即将提取镭的方法公诸于世。因而受到爱因斯坦高度的赞扬：“在所有著名人物中，居里夫人是唯一不为荣誉所腐蚀的人。”居里夫人这种不为名不为利，献身科学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李远哲幼小的心灵。使他立下宏愿，将来要当居里夫人那样的科学家。

高中毕业时，李远哲原本可以被保送到台湾大学医学院学医的，但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考上台湾大学化学系，后来又考取台湾的清华大学原子科学研究所，于1961年获得硕士学位。

三喜临门

年，26岁的李远哲告别家人，赴美国深造。

1965年，他获伯克莱加州大学化学博士学位，1965年到1968年，他

在劳伦斯伯克莱实验室和哈佛大学进行博士后的研究工作，1968年到1974年在芝加哥大学化学系任教，1974年后重返伯克莱加州大学化学系担任教授。为了吸取外国的最新科技成就，李远哲先后掌握了英、德、日、俄等国语言。李远哲长期坚持不懈地从事于交叉分子束方法的研究，以及对化学物相互反应的原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化学动力学方面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交叉分子束的研究有什么重大意义呢？

科学家为了要观察不同物质分子之间的互相作用，过去一般的作法是把不同的物质混合在试管或烧瓶里，再加热使其发生反应。但是，这样的实验，难以得出精密的测量和分析，也无法精密地加以控制。所以，这种传统的实验手段显然束缚了科学事业的发展。

李远哲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约翰·波拉尼以及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达德利·赫希巴克一起，从50年代到60年代，把现代物理学的方法引进化学领域，创制了分子束碰撞仪，离子束和分子束交叉仪等先进仪器，利用分子束碰撞来揭示分子互相作用的奥秘。所谓分子束就是一束高速分行的气体分子，它的方向、动能及动量都是可以控制的。李远哲等人运用这些仪器进行了开创性的分子束实验，测量和分析化学反应的每一阶段过程，使人们第一次能够对分子的化学反应进行动态的研究，为化学动力学的研究开创了新的领域，从而在物理化学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一块丰碑。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有位教授高度评价说，分子束实验完全改变了我们对大自然的看法，使我们观察到能源在分子周围活动的详细过程，即化学反应的动力机制。

分子束的研究首先在工业上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例如，利用这种方法可以更好地了解汽油燃烧的氧化过程，能够找出汽油更加充分燃烧的方法，对改进内燃机的设计和制造将起到促进作用。另外，利用分子束技术，在制造大规模集成电路时，可以把纯度极高的半导体物质积存在电脑板上，大大提高工艺水平。

凡是对人类文化科学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人，迟早都能得到世人的公认。对于李远哲来说，1986年是终生难忘的一年。该年3月，他和20名科学家一道，荣获里根总统授予的国家科学技术奖章；4月，接受了“彼得·德拜物理化学奖”，这是美国化学学会颁奖项目中的最高奖；10月，他又荣获诺贝尔化学奖。在一年之内，同时“三喜临门”的科学家是不多见的。他获奖后表示，这是“全体中国人的荣耀”。

高尚的品格

李远哲是一位品格高尚的科学家。

科学研究是异常艰苦的。为了探索化学世界的奥秘，20年来，李远哲全部身心都放在工作上，经常是清早就进入实验室，忙到深夜12点以后才回家，有时甚至几天几夜都埋头在实验室里不能回家。有一天，当他推开家门时，小女儿竟然问他：“叔叔，你找谁？”一时传为佳话。只有到了周末，他才打打棒球，偶尔看看电影或武侠小说，轻松一下，以便把实验做得更好。

李远哲从来不把自己当作超人的天才，他经常奉劝自己的研究生：“在科学研究上，先天的聪明不算什么，后天的努力却非常重要。”他还这样表示过：“很多人以为某某人得了诺贝尔奖，就成了某方面的权威。其实，他

还是他，没有什么了不起。他的成就是经年累月研究的成果，在研究过程中还必须依靠很多人力、物力的协助，绝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在大型科学研究事业中，每个人都像螺丝钉一样，缺一不可。”正是靠着这种精神，李远哲不断地攀登一座座科学的高峰。

李远哲在学术上取得成就后，时常前往中国大陆和台湾，将自己的成果贡献给海峡两岸的同胞。1978年，他随美国第一个访华科学代表团访问中国大陆后，又陆续前来进行学术交流。每次来访，他都作学术报告，介绍世界上最新的学术成果和自己的研究心得。他还寄来正在加工装配的一套分子束装置图纸给中国同行，并欢迎中国派人到他的实验室去实习。近年来，他的实验室接纳了很多中国派去的进修生和博士生。中国科学院化学所1986年4月投入使用的大型束源转动式分子束激光裂解产物谱仪，就是他和中国同行心血的共同结晶。它是目前世界上仅有的三套同类装置中的一套。后来，李远哲又亲自指导在大连生物所等地建立了三套分子束实验装置，这些设备对中国的科学事业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1980年，李远哲来华讲学前，曾给接待单位写了一封感人肺腑的信件。信里一再强调培养年轻科学家的紧迫性：“关于听课的人数，100人左右十分理想，除了有经验的科研人员以外，我希望至少有百分之二十是年轻的大学生或研究生。如果你们从重点大学里选20位三年级程度的大学生，他们有困难跟上的话，我愿意为他们多花点时间。”信里还表示：“我希望在中国期间尽量避免宴会。大家见面谈谈，简便的茶会便足够了，在宴会上花费财力是不应该的……虽说我在名誉上是北京化学所的研究教授，但现在中国外汇有限，我们中美之间的往返旅费，我将自己负担。”

李远哲抵达北京后，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在三周的讲学活动中，他上午讲课，下午辅导、回答问题，或是帮助化学所研制分子束实验装置，几乎天天忙到深夜，连安排他到大同云岗石窟的参观，都在他的力辞下取消了。由于李远哲的努力，为国内培养了人才，建立了相应的研究装置，这是他献给故国的一份厚礼。

世界心脏手术权威——张任谦

澳大利亚是在距离中国很遥远的南半球，1847年，第一批契约华工便来到这块大陆谋生，他们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在澳大利亚的开发建设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澳大利亚有个产金的地方叫本戈迪，每逢重大节日，居住在此地的华人都要舞龙游乐。这座城市里有个博物馆，珍藏着一条百米长的巨龙，是100多年前从广东台州运去的。这条长龙记载着华人在澳大利亚的历史，也表达了海外华人对祖国的思念。

据有关方面统计，现在澳洲的华人、华侨有25万之众，是该国的少数民族之一。华人在澳洲的地位逐渐提高，并涌现出一批有影响的人物。这其中有位叫张任谦的医生，他是世界上著名的心脏手术权威。

经历

几乎每一个成功的人士，都有其不平凡的经历，张任谦也不例外。他于1937年出生于上海，少年时代便赶上了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尝到了颠沛流离的滋味。曾举家从上海搬迁到新加坡，后来又迁移到缅甸的仰光，还回到过中国的重庆和香港居住过。1952年，张任谦刚15岁，便被父亲送到澳大利亚读书，在大学学的是医科。他最大的兴趣是做外科手术。外科医生是很辛苦的，做外科手术既要占去许多时间，也要消耗大量的体力。如果头几次手术不成功，还会被人指责。张任谦没有因为这些而失去信心，或者产生不愿干的想法。相反，他为了提高手术水平，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终于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

毕业后，张任谦又到英国深造。学成之后，他到美国做了多年的研究工作，最后，他回到澳大利亚定居和工作。经过长期的钻研和潜心工作，他终于在心脏手术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成就

张任谦医生在澳大利亚悉尼圣文生医院主持心脏手术以来，每年操作的大手术约五百宗，至今已主持过五千多宗心脏大手术。除为本地人治病外，东南亚等地的心脏疾病病人，向他求医者也不少。仅1983年，由他主持的心脏大手术病人当中，就有112名来自东南亚国家。通过他的手术刀，使许多人的生命得以延长。

由于医术高明，张任谦能把大部分的医治心脏有孔手术列为简单的手术，将心脏孔缝起来仅仅需要三分钟。1974年，张任谦成功地将一颗女性的心脏移植到一位男性病人的体内。手术后，这位男士活了62天才逝世。这是澳大利亚有史以来，第二宗成功的移植心脏手术。到1985年为止，他进行过14项心脏移植手术，仅有三例不成功。可见，他移植心脏手术的成功率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因此，他被誉为世界心脏手术权威。1984年，在数百人提名当中，张任谦被选为最伟大的澳洲人。他的成功得到澳大利亚社会一致的公认。

目前，全世界共有12个心脏移植中心。澳大利亚仅有一个，还是张任谦经过10年的奋斗，才说服澳大利亚政府办起这家医院——澳大利亚国家心脏

中心，由他负责主持工作。张任谦希望他所领导的这所医院，能赶上世界第一流——美国史丹福大学心脏移植医院的水平。

张任谦强调，设立心脏中心是当前各国医疗事业的迫切任务之一，因为心脏病造成的死亡率已经超过癌症而成为人类的第一杀手，癌症总有一天会在先进的医药研究中得到治疗，心脏病却不然。因而，张任谦决心不仅要在心脏移植手术研究上取得更大的成果，而且要向人造心脏领域迈进！

张任谦的医学成就已经非常惊人，但他并不满足于现状，在极度繁重的工作之余，还是不断地进修和钻研。他还热心帮助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心脏手术，协助过印尼、新加坡、香港等地开展这项造福人类的尖端工程。

张任谦勤奋、无止境地为社会服务。他每天的工作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早晨7时到傍晚7时是他紧张的工作时间，而从黄昏到次日黎明，也是他工作的宝贵时间。他谦逊，从不炫耀自己。每当他的工作受到外界关注时，他都把荣誉让给自己属下的医护小组成员。澳大利亚报纸称赞张任谦是“富有远见的人，协助创造今日澳大利亚的人。”

愿望

喝洋水成材的张任谦，一直关怀着自己的故国。1972年，当中国大使赴澳大利亚，仰慕这位杰出的华人心脏手术专家，邀请他前往中国协助发展心脏手术时，他立即应承下来。他期望中国强盛，期望中国的医学界有所成就。“恰恰因为我是个中国人”是他回答热爱中国、帮助中国的最简单、也最动人的一句话。

1977年，张任谦首次访问中国。当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很多情况不够理想，医学界的情形也一样停滞不前。在第一篇有关中国心脏手术的报告中，他曾批评中国的心脏手术水准低，设备差，方法更是陈旧，更严重的是许多医生都没事干。单在心脏手术上，至少落后国际水平10年。他的意见受到了中国有关方面的重视。中国政府邀请他出任中国心脏手术发展咨询顾问。他每年两次到中国来主持心脏手术医生训练及研讨会。同时，他每次都带回一名中国心脏手术医生到澳大利亚受训，同时为中国心脏手术医生访问澳大利亚创造条件，使他们有机会接触现代化的设备，吸收更先进的医学知识。在他的热心帮助下，一度极为落后的中国心脏手术在数年内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张任谦自信地表示：“我非常高兴看到显著的成绩。中国目前共有75个心脏中心。10年来的努力，中国心脏手术的水准现可领先东南亚国家。”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曾在人民大会堂，感谢这位华裔医生在促进中国心脏手术发展上所作的贡献。

也许在若干年后，在澳大利亚的博物馆里，将陈列龙的传人的业绩，就像那条百米的巨龙，被人瞻仰、颂扬。张任谦的名字会被广大的人们永远记忆在心中。

国际建筑界的“奇才”——贝聿铭

青少年朋友，你听说过“普里茨克建筑学奖”吗？它往往被人们比作国际建筑界的“诺贝尔奖”。自从1979年设立以来，每年颁发一次，奖金额为10万美元。获得这项殊荣的第一位华人就是贝聿铭。

梦想

1917年4月26日，贝聿铭出生在广州，后来全家搬到人人称颂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苏州城居住，他在这里度过了愉快的少年时光。苏州城有许多中外闻名的园林古迹，尤其是元代园林建筑的代表作——狮子林，更是他经常玩耍休憩的场所。古代能工巧匠在园林中留下的艺术珍品引起了浓厚的兴趣。

11岁时，贝聿铭举家迁居上海。使他从小、巧、古的中国园林走进高、大、洋的西方建筑境地，眼界为之一阔。他走在最繁华的南京路上，专心致志地观赏着一幢幢高楼大厦，尤其是当年屹立在上海滩的庞然大物——最高的国际饭店，从楼上到楼下，从外表的布局到里面的摆设，他都不厌其烦地反复琢磨个透。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已经立下了宏伟的志向——当一名建筑设计师。

新星

1935年，贝聿铭前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学习。毕业时，面对二次大战的硝烟，做为一个正直的中国人，他毅然参军，在美国空军从事三年的科研及发展工作。退役后，又到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便在该校当助教。他与一个中国留学生结了婚，在波士顿安了家。

1948年的一天，当美国地产大王柴肯道夫需要修建自己的私人办公室时，有人推荐贝聿铭担任此职。这位地产大王抛弃种族歧视的偏见，打破美国建筑界的惯例，首次聘用中国人为建筑师。他的这间圆形的办公室需要建在自己开设的公司总部的楼顶，所以，它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成功与否自然对这位年轻的设计师至关重要。经过贝聿铭的精心设计，办公室落成后，倍受赞赏。柴肯道夫称赞说，这位东方人不仅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具有超人的智慧。于是，他便把丹佛、纽约等地几座20多层的大厦和加拿大一组建筑群的设计任务全都放心地交给了贝聿铭。

经过几年的实践后，贝聿铭先在纽约开设了自己的建筑设计事务所，1958年便成立了“贝聿铭设计公司”，专门承担工程的设计事务。从此，一颗新星便在美国建筑界的夜空升了起来。

杰作

在美国的许多大城市中都有贝聿铭的作品，其中有不少今世人广为称道的建筑，如他设计的费城社会大厦。这是三栋高入云霄的公寓，专为受薪阶层的小市民而建的。它既符合小市民的需求，也考虑了小市民的经济能力，更注意了他们的生活方式。由于选用了突出的窗框来作支架，起到了遮阳光、

避风雨的作用，美观而又实用，受到居民的欢迎，因而赢得了费城立斯大学赠送的“人民建筑师”的光荣称号。

人们经常赞叹的是贝聿铭用 10 年时间建成的，华盛顿国家艺术馆东大厅。

位于首都市中心的国家艺术馆原有一座西厅，因为展览面积不够用，急需扩建一座东厅。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和周围一些高大著名建筑物的影响，没有巧夺天工的本领，就难以使东厅和西厅珠联璧合，同时又要和周围建筑群和谐统一。

贝聿铭出手不凡，其设计既复杂又简单。他十分巧妙地把建筑面积划分成两个互相连接的三角形——一个等腰三角形，另一个是直角三角形。前者内设中央大厅和陈列馆，后者为艺术研究中心。如此简洁、明快、大胆的构思，不但使新旧建筑物均衡对称，和谐统一，而且赋予新大厅以一种全新的韵律。这座建筑物的特色，是用不同的高度、不同形状的平台、楼梯、斜坡和廊柱交错相连，给人以变幻无穷的感觉。整个设计，加上从不同角度透过多种图案的天窗射入的阳光，令人目不暇接，兴致勃勃。这种把立体几何原理和各种艺术陈设揉合在一起的独特设计，改变了几千年来建筑给人们的静观感觉，使人们享受到立体、逼真、变化的美感。

1978 年 6 月 1 日，美国总统卡特参加了落成典礼并剪了彩，他在即兴讲话中盛赞贝聿铭的天才设计，他说：“这座建筑物不仅是首都华盛顿和谐而周全的一部分，而且是公众生活与艺术之间日益增强联系的艺术象征。”开馆以后，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前来参观。被大家公认为是“当代最杰出的博物馆”。纽约一家中文报纸更是自豪地说：“在曾对美国文化提供重大贡献的伟大人物名单中，现在添上了贝聿铭，这使所有的华人都感到光彩。”

1983 年，贝聿铭又荣获该年的“普利茨克建筑奖”。他是获得此项世界性最佳建设成就殊荣的第五个人，这是对他几十年来的建筑设计的充分肯定。美国建筑评论家贺斯德宝说：“贝聿铭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优秀的建筑家。”

贝聿铭把“普利茨克建筑奖”授予的十万美元奖金作为中国留学生的奖学基金。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因为我发觉不少中国建筑师来到我的建筑事务所实习，由于国家给他们的钱不多，故此不能到太多的地方参观，不能看到更多比较重要的建筑物。这项奖金是给予那些在美国留学，而又想前往美国各地或欧洲游历，看一看世界各地建筑物的中国留学生和年轻的建筑师，这是游学奖学金。因为学建筑，纸上谈兵不如亲自目睹，愈看得多经验愈丰富。”

不仅在美国，在世界各地，贝聿铭也留下了许多著名的建筑物，如：加拿大蒙特利尔市的玛丽大商场、澳大利亚墨尔本市的科林斯广场、新加坡的莱佛士国际中心、伊朗德黑兰的工业贷款银行大楼……凡是由他设计的建筑都成了人们游览、观赏的建筑艺术杰作。

故国情

贝聿铭于 1973 年第一次故国重游后，便经常回国访问。1979 年，他接受了北京香山饭店的设计任务。和这位摩天大楼设计师以前的设计相比，这个工程显得很小，但却是又一次对他严峻的考验。因为他面临着重大的课题：

如何将现代化的建筑物与中国的传统建筑物融合起来。最后，他决定在中西方文化巧妙结合起来的同时，把自然环境美和建筑艺术美高度和谐的统一起来，用传统的砖瓦替代钢筋水泥玻璃做为建筑材料。

建成的香山饭店占地 3 万平方米，共有 4 层，五座白墙青砖的楼群错落落地嵌入山坳。从外表看似不出众，甚至还有点怪异的感觉。如果你沿着山坡走上去，穿过一个照壁洞门进入饭店，里面豁然开朗。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主庭园，内中有个 1400 平方米的人工湖，两棵 800 年雌雄白果树伫立在湖畔两岸。周围还有 11 个小庭园，千姿百态。在其间漫步，仿佛在画中游的感受。五座楼房凭山势而立，错落相连，犹如五颗熠熠明珠镶嵌在红叶丛中。客房内的设备是世界一流水平，应有尽有，符合中国式的格调：典雅、舒适。尤其可贵的是采用了传统的中式窗户，当旅客卷起竹帘，凭窗眺望时，远山近树，微风拂面，享受的是一幅山水画、一首田园诗，美不胜收，妙不可言。

1984 年 5 月，在美国建筑学会举行的年会上，前往香山饭店考察的专家评论说，贝聿铭的设计是把传统的中国建筑艺术和当代先进的技术娴熟地结合起来，产生了一个完全适合所在环境的建筑艺术品，因此不仅为中国，也为全世界提供了一个典范。在这次年会上，评委会从 500 个候选的建筑物中选出 13 个授予该年度荣誉奖，其中便有香山饭店。

贝聿铭，亿万炎黄子孙为你骄傲！

罕见的语言学家——赵元任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在中国的知识界曾流传着这样一首歌曲：

天上飘着些微云，
地上吹着些微风，
啊！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
教我如何不想他？
月光恋着海洋，
海洋恋着月光。
啊！这般蜜也似的银夜，
教我如何不想他？
水面落花慢慢流，
水底鱼儿慢慢游。
啊！燕子，你说些什么话？
教我如何不想他？
枯树在冷风里摇，
野火在暮色中烧。
啊！西天还有些残霞，
教我如何不想他。

这首表达了海外游子思念祖国、故乡、朋友和亲人眷恋之情的著名歌曲的词作者是现代著名的诗人刘半农，谱曲的便是博学多才的世界著名的语言学家、业余音乐家——赵元任。有人说，赵元任具有哲学家的头脑，音乐家的耳朵，文学家的才气，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的思维。他学识广博，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作过突出的贡献。

多彩的年华

祖籍江苏常州的赵元任，1892年11月3日出生于北方的天津。由于祖父差事升迁的原故，在他9岁前，几乎一年要搬一次家，先后在天津、北平、保定、磁县、冀州等地居住过。童年的赵元任体弱多病，但他最喜欢的一件事，便是早早起来欣赏旭日东升，双眼一眨也不眨地紧盯着冉冉升起的朝阳，他总觉得早霞比晚霞耐看，直看到眼睛发花。大人们忙警告说：“不能对着看太阳，当心把眼睛看瞎了。”幸而他的眼睛并没有受到损坏。后来他得到一面三寸大的放大镜，便想出了好些法子来玩，比方说用透镜使阳光聚焦引燃物品，或者将倒影映在纸上，这一切都启发了他对科学的兴趣。6岁那年一次月食现象，令他难忘；他还爱观赏打雷闪电的自然景象；对彗星也感到极有兴味。

10岁那年，赵元任祖父去世后，全家搬回南方的常州。赵元任自小耳朵就格外精细，对各种地方口音十分留心，喜欢学习方言，曾经跟着保姆、姑妈学会了保定话和江苏的常熟话。回到家乡后，他耳濡目染，说得一口地道的常州话。不久，父母相继去逝，赵元任被送到苏州姑妈家去，很快又学会了苏州话。后来，他又跟同学学会了南京话、福州话等多种方言，为他日后致力于语言学的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

14岁时，赵元任回到常州，首次进入一所现代化的学校——溪山学校读

书，学习古文、历史、英文、数学，还有体育。从1906年起，他每天都认真写日记，一直到晚年几乎没有中断过，尤其喜欢在日记中掺杂英文，写些自己才看得懂密码。

后来，他到南京读了三年江南高等学堂。学了英文、物理、德文及三角代数。他对英文极感兴趣，读了许多课外书，还特地买了本大学字典查生字。这期间他也还试着制作望远镜和显微镜，并且第一次接触到钢琴。

1910年，年满18岁的赵元任考取赴美官费留学，在与胡适等72位同行的同伴中，他名列第二。

博学多才

赵元任到美国后，先是在康奈尔大学主修数学、物理，由于聪明好学，每学期的成绩总在90分以上，毕业时数学得了两个100分，天文学得了100分，这是该大学自建校以来最好的成绩。1915年，赵元任获得一笔奖学金，转入哈佛大学攻读哲学，三年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赵元任是一位语言天才，他除了精通英文，掌握法、德、日、俄、西班牙、古希腊文、拉丁文等多种外语，主要对中国方言及汉语文化的研究有极深的造诣。胡适曾赞叹道：“元任辨音最精细，吾万不能及也。”他能够在一个星期内学会一种方言，一共能运用33种方言进行交谈。有一回，赵元任与8位来自不同地方的客人共同就餐，席间南腔北调，辞不达意，唯有他能操8种地道的方言，分别与友人谈笑风生，举桌惊叹不已。

1926年，赵元任正式从事语言研究，他是采用实验语言学的科学方法，在我国华东和华南进行方言调查的第一位学者。这次调查工作，他灌录唱片2000余张，被世界语言学界誉为语言学上的一大贡献。后来，他又致力于统一国语的推广工作，赵元任所做的工作被教育部加以肯定。教育部正式确认北平语音为国语的标准音。赵元任有关语言学方面的学术专著和论文，为中国现代语言学、语音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在中国语言学界一向尊他为“汉语言之父”。他对音位学理论、中国音韵学、汉语方言、语法均有深湛的研究，他的许多专著包括1968年出版的《中国口语语法》（英文版）都是有独创见解的作品，被誉为本世纪语言学范畴内最重要的著作。

赵元任精力过人，兴趣甚广，他虽然从未以音乐为职业，但先后谱写的歌曲、钢琴曲达100余首，出版过《新诗歌集》、《赵元任歌曲选集》和《儿童节歌曲集》。他撰写过一册文笔流畅的《早年自传》，还有译作，特别是为孩子们翻译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流传甚广。

学风与人品

1925年，清华大学增办国学研究院，赵元任被聘任为研究院的导师。研究院招了一个研究班，32名同学中，随赵先生学习语言的仅有一人，就是后来成为语言学家的北大教授王力。王力跟随赵元任虽然只有一年时间，但在为人治学方面，却深受影响。

有一次，王力写了一篇论文《两粤音说》，送给导师审看。文章中有个观点，认为广州话里没有撮口呼。王力是广西博白人，博白话确实没有撮口呼。但广州话中有没有，赵先生没有亲自调查过，没有把握。但通观全文，

赵元任认为写得还可以，便推荐给《清华学报》发表了。王力毕业后，在导师鼓励下到法国继续学习语言学。后来，赵元任到广州进行了方言调查，发现广州话里有撮口呼，他连忙写信给远在异国的学生，信中以“雪”字为例，证明广州话里就有撮口呼，《两粤音说》中的观点错了。王力细读导师的来信，心中羞愧万分。两广方言尽管有许多相同之处，但也存在不少差异。自己以博白话没有撮口呼便主观推断两粤没有撮口呼，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王力深深为导师治学严谨一丝不苟的好学风所折服。

1981年夏天，赵元任重访中国时，北京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的荣誉证书。会上，王力在致辞中介绍说：“赵老是国际著名的语言学家，美国语言学界有一句评语：‘赵先生永远不会错！’他又博学多才，做过数学家、物理学家，精通英、法、德、日多种文字，对哲学也有很深的造诣，又是个音乐家，他的成就首先是‘博’，然后是‘约’。”介绍完毕，在众人的盛情邀请下，赵元任兴致勃勃高歌一曲“教我如何不想他”。歌罢，当有人向他求教，曲中具体表现的思念为何物时，他笑着说，这个思念的东西代表着一切心爱的他、她和它。

人如其曲，赵元任对故乡有浓厚的感情，他一生待人真诚，品德高尚，对爱情尤为忠贞。

赵元任是1921年与医学博士杨步伟女士结婚的。当时的婚礼十分简朴，他们事先写了一纸不足50字的证书，申明彼此的感情和信任“永久存在”，做了四碟适口的小菜，然后请来胡适博士和杨步伟的同事朱小姐共进晚餐。席间，四人在证书上郑重地签名，婚礼便告结束。这样的新式结婚仪式在报上刊登后，轰动一时，传为美谈。赵元任沉默寡言，杨步伟言词锋利，他们不仅职业不同，而且性格迥异，然而彼此相敬如宾，共同度过了60个极其有意义的春秋。这对夫妇共抚育了四个女儿，孩子们读书出类拔萃，学有专长。

赵元任夫妇生活简朴，平易近人，待友真诚。家里经常是宾客盈门，不仅有老舍等知名人士，更有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友人、学生。只要有人需要帮助，他们都会尽力而为。人们赞誉赵元任在美国的家为“留学生之家”。

赵元任在美国定居40多年，始终念念不忘养育过自己的祖国。同样，祖国人民也时刻惦念着这位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作出过突出贡献的语言学家。1973年，当赵元任夫妇在解放后第一次回国访问时，周总理在百忙中接见了他们，进行了三个小时的深谈。

1982年2月24日，赵元任因心脏病在美国病逝，享年90岁。他平日总将一本《唐诗三百首》放在床头，就在去世的前一天晚上，他还用常州语轻声吟读着“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诗句。按照他生前的愿望，没有举行任何丧葬仪式，亲属将这对恩爱夫妇的骨灰合在一处，撒在连结中美两国大陆的太平洋中。

平民教育家——晏阳初

对于今天的青少年朋友来说，晏阳初这个名字是陌生的。但是，在本世纪的 20 年代，海内外就早已传遍这一响亮的名字。他不仅在中国发起过著名的平民教育运动，还帮助过菲律宾等发展中的国家重建农村，因而被人们赞誉为“现代农村圣徒”和“国际平民教育权威”。

“晏阳初法案”

晏阳初出生于 1893 年，祖籍为四川省巴中县。20 世纪初，这位天府之国的聪颖好学的青年便赴美深造。由于刻苦钻研、成绩优异，他先后获得耶鲁大学学士、普林斯顿学院硕士和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美国参加了志愿队，前往法国服役。

大战期间，欧洲战场劳力不足，就先后从中国招募了大约 23 万名华工从事各种苦役。这些华工绝大多数是目不识丁的农家子弟。晏阳初到巴黎后，接触到许多来自中国的“欧战华工”，深深感到自己的同胞由于没有文化而遭遇许多苦难。他意识到，中国人有四大病患，即“愚”、“贫”、“弱”、“私”。而“愚”更是四患之首，要医治这些顽疾，非从教育入手。

25 岁的晏阳初放下架子，离开舒适的生活条件，满腔热情地深入到华工聚居的工棚，默默无闻地为他们写家信、读书报、当翻译。他还筹到一笔资金，创办了汉文识字班，自己编写并教授识字课本——《千字课》，为了帮助华工们提高文化，沟通乡音，他还创办了一份《中华日报》。这一系列活动便是晏阳初从事艰苦的平民教育的起始。

大战结束后，晏阳初于 1920 年回到动荡不安的祖国。他先在北平发起组织了“大众教育联合会”，随后又倡导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总会”，亲自出任总干事长。为了提倡扫盲运动，他们编写了数百种普通读物，广泛散发，激励民众奋发图强。三四年间，参加扫盲学习的人数达十几万人，收到良好的效果。

1926 年至 1936 年间，晏阳初选择了河北省定县作为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革的试点。他把巴黎办学形成的思想加以深化，提出了“以文字教育医愚，以生计教育医贫，以卫生教育医弱，以公民教育医私”的方针，对广大农民实施基本教育。

在定县，晏阳初全家人住在县城东大街的一所四合院里，他经常骑着毛驴下乡，跑遍全县各个角落，不辞辛苦地为广大民众服务。他还亲自填词，创作了《平民教育歌》，用以激励自己以及志同道合的朋友。经过他们的努力，共同创办了育才学校，培育了数百名学生；开办保健医院，为贫苦农民看病，宣传节制生育；兴办农场和果园，从日本引进粮、棉、果、禽良种；设立县广播电台，组织农村剧团，活跃文化生活。这些工作得到当地政府和广大农民的支持，取得显著成绩。

晏阳初的理想当然不只是为了改造一个县。1928 年，他赴美讲学并接受耶鲁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称号。利用这个机会，他募集到 15 万美元的经费。第二年回国后，他便在定县成立“中国农村建设运动工作总部”。为了将定县的经验推向全国，他还先后在湖南的衡山，贵州的定番以及四川的许多县办起了实验县。抗战期间，他又在重庆创办了“中国农村建设学院”，自任

院长，培养了一批乡村建设人才。经过他的不懈努力，一些村镇确实出现了不少可喜的景象。当年，晏阳初自然无法使战火纷飞的中国农村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他那种献身平民教育的精神足以令世人敬佩。

1943年，美国曾组织了一个由150名学者和知名人士组成的评选委员会，评选世界十大人物。入选者必须是对社会有突出贡献和较大影响的人士。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不但影响着八千万中国人，而且影响到国际间”，卓有成效，得以与爱因斯坦、杜威等人一起被评为世界十大名人之一。

二次大战后，为了争取外援，更好地发展农村经济，晏阳初于1947年再赴美国，以他的声望，经过多方游说，破天荒地在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非美国人提出的法案——“晏阳初法案”，该法案同意拨出2500万美元专款，帮助中国推进农村建设运动。获得经费后，晏阳初立即回国，于1948年在南京建立了“全国农村复兴联合总署”，开展全国农村教育和发展农村经济的工作。

故土情

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晏阳初被聘担任国际平民教育委员会主席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顾问，他于1950年旅居美国。

中国人民始终没有忘记这位对中国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做过贡献的功勋卓著的老人。邓小平同志访美时专门询问过他的情况。在晏阳初90大寿时，原中国乡村建设学院部分校友致信向他祝寿。

1985年9月初，已届92岁高龄的晏阳初以“国际乡村建设学院”董事长的身份，应中国人民的邀请，回国观光考察。他受到中国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出席了一些欢迎茶会，并到河北、江苏、四川一些县市参观访问，最令他难忘的是重访定县。

尽管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平民教育发祥地的人民依然记得当年身穿马褂下乡办学的平民教育家。他的故居也修缮一新，当年的老房东将保存至今的平教会的照片献给这位远道而来的海外游子。

解放30多年的定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育普及，人民健康水平大大提高。当年晏阳初从日本引进的十几株倭锦苹果已遍种全县，并增加了十几个品种。面对定县的新天地，晏阳初感到十分欣慰，因为“愚”、“贫”、“弱”、“私”的固疾已基本消除，他终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已经在自己的故国家园得以实现。

晏阳初怀着无限深情离开中国返美前夕，万分感慨地表示：“我一生别无他求，唯有献身事业才是最大乐趣。回去以后的首要任务，是向我的同仁介绍和推广中国农村改革的经验，使之尽早在第三世界的广大乡村生根开花。”

国际摄影大师——黄宗霑

在国际影坛上，有一项为世人瞩目的电影艺术大奖——奥斯卡金像奖。它自 1929 年颁奖以来，有一位华裔艺术大师，曾经被 16 次提名角逐最佳摄影金像奖，其中有两次捧回金像。这位了不起的美籍华人叫黄宗霑，有的评论家称赞他为世界最佳摄影师。

他来自社会底层

1899 年 8 月 28 日，黄宗霑降生在著名侨乡广东省台山县的一个普通家庭。5 岁那年，父亲带着他离开了故乡，远涉重洋来到美国定居。这个脸面平平、个子矮矮的黄皮肤孩子既要忍受继母的打骂、虐待，还要遭受白人孩子揪住小辫子的戏弄和污辱。他曾经用拳头还击过，但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甚至有个白人教师由于不愿意教授这个中国孩子而辞职不干，这真是奇耻大辱啊！小小年纪的黄宗霑体验了许多辛酸和磨难。

16 岁那年，黄宗霑的父亲去世。他被一位世叔收容，在罐头食品厂里装沙丁鱼，兼而参加拳击比赛。由于个子矮小，他每次比赛都被打得鼻青脸肿，他被迫改行在一家旅店里当杂役。

有一天，身无分文的黄宗霑正在洛杉矶市街头流浪，偶然看见有人在公园里拍摄喜剧影片，他顿时产生了兴趣，加上一位朋友的鼓励，就决定去学这门手艺。他用搜集在一起的许多废瓶子换回了一台盒式照相机，自己反复琢磨，逐步掌握了照相机的性能，学会了摄影。

自强不息

黄宗霑先在一家照相馆里做摄影师的助手，但他不满足于人像的摄影工作，渴望当一名电影摄影师，拍摄活动的景物。

经过朋友的介绍，黄宗霑得以进入“明星电影公司”，先是负责打扫摄影室，后来当“拍板员”。在几年默默无闻的岁月里，他勤奋工作，刻苦钻研摄影技术，终于脱颖而出，展示出他那与众不同的才华。

有一回，要拍金丝鸟婉转啼鸣的镜头，但不管人们如何引逗，小鸟就是不张嘴，导演急得毫无办法。正当摄影师一筹莫展之际，黄宗霑胸有成竹地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把一片口香糖塞进小鸟的嘴里，逼得小鸟不得不转动着嘴，想把糖吐出来，恰在它一动之机，抢拍下所要求的镜头。这成功的一招，足以令人们对他刮目相看。

还有一次，在拍摄一部战争片时，有个表现德国鱼雷艇发射的鱼雷击沉了美国商船的镜头。导演要求拍出鱼雷发射、击中的全过程。按当时的技术，难以达到这个要求而且冒险性很大，摄影师干脆拒绝拍摄。黄宗霑却自告奋勇承担了这一重任。他把自己和摄影机同时绑在鱼雷艇的发射筒上，然后让鱼雷艇缓慢下沉，只留下人和摄影机在海平面上。黄宗霑勇敢而顺利地完成了拍摄，当人们看到洗出的样片时，无不大大加赞赏。随后，黄宗霑被升任为第二助理摄影师，获得操纵摄影机的资格。他终于脱颖而出，深受好莱坞电影制片人和导演的关注。

攀登艺术的高峰

黄宗霑成为正式摄影师后，展现在他面前的仍然是一条崎岖的道路。

由于美国政府从 1882 年起实施《排华法案》，使在美国的华人长期处于无权的境地。20 世纪 30 年代初，当黄宗霑与美国女作家兼诗人桑洛娜结婚后，因为他是华人，竟得不到结婚证书。他买下的房产，也不能用自己的名字，只能用太太的名字立契约。第二次大战期间，当一位著名导演邀请他随军从事摄影工作，又由于他不是美国公民而遭到拒绝。黄宗霑申请加入美国国籍，直到美国政府废除《排华法案》之后三年，即 1947 年才得到批准。

黄宗霑虽然一生不断受到种族歧视，他逆水行舟，始终坚持迈向自己既定的目标。即使在别人给他最劣的器材，一举一动受到最苛刻监视的状态下，他仍然不断进取，锐意创新。他尤其注意探索电影的根源——光。专心致力于光的研究，无论他在什么地方，比如夜总会、马戏团、理发店，对当地当时光线的来源和性质，他都认真琢磨，所以能够对任何时间、季节和气候的光都了如指掌。对光的迷恋致使他能在门廊前坐上几个小时来观察和欣赏庭院中阳光照耀下大橡树的影像。孜孜不倦地学习促使他摄影和导演的许多影片，都取得了辉煌的业绩。

黄宗霑有当过拳师的经验，又深入地研究了光在电影中的巧妙作用，创造性地运用了光源，使他成功地拍出了美国电影史上最佳拳击片之一——《肉体与灵魂》。为拍此片，他采用了以前从未有人用过的方法——两只脚穿上四个轮子的溜冰鞋，两手拿着轻便的手提摄影机（他是最早使用这种机器的摄影师之一），由别人推动着从最佳角度拍摄出非常精彩的拳击动作，这种高速度的摇镜头、跟镜头、左右俯仰，动作的敏捷，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令观众在观赏时，仿佛亲自参加打斗一般，效果极佳。

根据名著改编的《汤姆·莎耶历险记》是黄宗霑拍的第一部彩色电影，当时公司规定内景照明要用 800 至 1000 瓦的灯光，但他只用了 350 瓦。他认为光源好比时装，不在华丽，而在得体。由于他的独具匠心，片中那白色的木板教堂，缓缓流淌的密西西比河，被平实的技巧描绘出来，恰似童年的梦幻。其中山洞的场景更是无法忘记。几十年后，这部影片依然被摄影家叫绝。1974 年，《滑稽姑娘》的续集《滑稽女郎》在拍摄过程中，由于摄影指导对滤镜的实验使影片发灰，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谁能收拾这个烂摊子呢？制片人知道，只能使黄宗霑出山。可是老人已 70 多岁的高龄，重病缠身，卧床不起，如果参加工作可能会断送生命。为了艺术事业，黄宗霑还是挣扎着上阵，几次昏倒在拍摄现场。待到完成此片时，他已人形枯槁、憔悴不堪。这次的奋斗，使他赢得了最后一次奥斯卡金像奖提名的荣誉。

黄宗霑在异国影坛奋战了 57 个春秋，共拍摄了 125 部影片。由于他的卓越成就，他生前就被列入“全世界十大电影摄影师”的行列。

终生的憾事

1929 年春，颇负盛名的电影摄影师首次返回祖国，这对于处在草创时期的中国电影界，确实是个大喜讯。黄宗霑到达上海时，受到电影界人士的热烈欢迎。留沪期间，他和同行们交换摄影技术与设备方面的意见，介绍了许多美国新出品的摄影机械，促成中国的电影公司后来向美国订购了一批新式

机械，补充片场设备。

当时，上海的电影公司不太重视化妆师的作用，许多演员都是自己化妆，效果自然不理想。黄宗霑针对这些现象，多次与胡蝶等影星座谈，讨论演员化妆及表演艺术，帮助他们分析了化妆与摄影的关系，终于引起了电影界对化妆师的重视。黄宗霑还介绍了美国电影的成就与不足，这些对于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都起过积极的影响。

1948年，黄宗霑第二次回到故土，渴望实现自己多年的宿愿——亲自导演和拍摄《骆驼祥子》，将老舍的这部闻名中外的名著推上银幕。为此，他请人编写了电影剧本，做了许多准备工作，甚至邀请当时著名女影星黎莉莉饰演虎妞的角色，并在他的私人摄影室里试拍照片。黄宗霑到达北平后，还拍摄过一些黄包车夫的素材。当时，战云密布中国大地，电影大师的拍片愿望无法实现。回到美国后，他还采取了一些补救办法，试图完成这部影片。一年后，他细致分析了分镜头，经过反复考虑，终于放弃了这一计划。这位严谨的艺术家认为，在异国土地上，再高明的摄影师也难以拍出京味十足的影片。他无法为自己的故国献上一份厚礼，这成了他终生最大的一件憾事。

1976年盛夏，这位76岁的艺术大师走完了艰辛而光辉的一生，安详地辞别了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文学事业的建筑师——聂华苓

年，有 300 多名世界知名作家联合提名美籍华裔女作家聂华苓和她的丈夫，美国著名诗人保罗·安格尔为诺贝尔和平奖金的候选人。这不仅是由于聂华苓在文学上的成就，更主要是她俩在开展国际文化交流方面做了突出贡献。

不屈的个性

聂华苓于 1925 年 1 月 11 日出生在湖北省宜昌市，因此，她还有一个名字叫“宜生”。聂华苓的父亲在军阀手下当个小官员，为了 口，经常携带全家东跑西颠，不得安宁。后来，她的父亲竟死在战乱中。当时聂华苓刚 10 岁。她的母亲 30 岁便守寡，怨多于爱，经常以泪洗面，使得聂华苓从小就缺少家庭的温暖。

卢沟桥事变后，全家乘船离开武汉，开始逃难，先后到过宜昌、三斗坪、重庆等地，不仅衣食没有着落，还险些被淹死、炸死。聂华苓在四川长寿国立 12 中读书时，与 6 个从湖北来的女孩常一起相聚，被人们戏称为“竹林七贤”。高中毕业时，她原本被保送到西南联大深造，但由于买不起从重庆到昆明的车船票，无奈只得进入中央大学外文系。日寇投降后，聂华苓随同学校迁往南京。1948 年，她以远思的笔名发表了处女作《变形虫》。

1949 年，聂华苓举家迁居到台湾。不久，母亲积劳成疾，得了肺癌，正当病情恶化时，弟弟又在一次飞行事故中不幸丧生，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使聂华苓坚强地担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

聂华苓很快便成了台湾文化界的活跃人物，起先她在《自由中国》半月刊任文艺版编辑，她热心扶植文学新人，力荐优秀作品，因而获得文学伯乐的美称。由于该杂志宣传民主，常有抨击时弊的文章，终于在 1960 年被当局查封，刊物主编被判刑 10 年，聂华苓的家也受到搜查，并由此失业而生活陷入困境，以至在母亲病逝时，她连安葬费都拿不出。有 4 年时间，聂华苓只能闭门译著，后来是友人冒风险邀请她出来在大学任副教授，讲授文艺创作课。不管环境如何险恶，她从来不向命运低头，更不会屈服于暴政。相反，生逢乱世，人世间的种种悲欢离合，却为聂华苓从事文艺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文学成就

1948 年，聂华苓在南京读书时，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生涯。1953 年，她的第一部中篇《葛藤》出版，这部抒写台湾被压抑阶层苦楚的作品，引起了人们的共鸣。60 年代，她以短篇小说出名。第一部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是描写思乡题材的作品，这是她的成名作。随后短篇小说集《翡翠集》、《一朵小白花》、《王大年的几件喜事》等先后问世，因而名噪一时。

《桑青与桃红》是聂华苓的代表作。她从 1970 年着手创作，经过两年努力完成了这一力作。先在台湾《联合报》连载，据说由于涉及政治问题，中途遭禁。后来在香港《明报》月刊全文刊载后才正式出版。小说写的是 1945 年 7 月至 1970 年 1 月间，一个中国女子从中国大陆到台湾，再到美国的坎坷

经历。

此外，聂华苓还有散文集《梦谷集》，论文集《沈从文评传》、《三十年后——归人札记》等等。编译的作品有《德莫福夫人》、《美国短篇小说选》、《百花齐放集》等。

不平凡的作家总有段不平凡的经历。有人描写聂华苓，说这位典型的中国女人“不是光芒迫人的太阳，不是闪闪烁烁的星星，而是柔美朦胧中透出明朗的月亮。”她的作品虽然不多，但质量很高，笔调优美，文字练达，意境清新，感情饱满。她善于把深刻的主题思想和对生活的真实描写，有机地结合起来，既继承了我国文学传统，又大胆吸收西方文学技巧。

聂华苓的不少作品曾被译成英、葡、波、匈、意等国文字，广为流传。自1980年以来，她的作品如《台湾轶事》、《失去的金铃子》、《桑青与桃红》、《德莫福夫人》、《黑色、黑色、最美丽的颜色》、《千山外，水流长》等著译作品已在大陆陆续出版，颇受读者欢迎。

“国际写作计划”的诞生

聂华苓的丈夫保罗·安格尔是美国著名诗人，他们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有相识的。

安格尔从高中便开始写诗，曾出版过10本诗集，他的诗感情真挚，并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他受聘于美国爱荷华大学时，于1940年主持该校作家写作室的工作。这个写作室每年邀请三四名作家到那儿去活动。1963年，安格尔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笔款项，便到亚洲去物色一些作家。当他路过台湾时，在一次酒会中遇见聂华苓。他们一见如故，交谈十分投机，很快，他们相爱并结了婚。第二年，聂华苓摆脱了台湾特务的监视，赴美参加了丈夫领导的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室”的工作。

1966年，聂华苓向校方倡议成立一个“国际写作计划”的机构，每年分批把世界各国著名的作家请到爱荷华，为他们提供文艺创作和互相交流的机会。她的想法得到安格尔的大力支持，但是在经费上困难重重。两人为此东奔西跑，筹措资金，付出了不少宝贵时间和精力。1967年，第一届“国际写作计划”的文学组织机构终于成立了，共有18位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作家在这里共同生活了9个月。此后，每年9月至12月，这个写作中心就住进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三四十位作家，在风光如画的爱荷华，在飞红滴翠的“五月花公寓”，从事写作并交流创作经验，或在此休假。1970年以后，这一机构得到了美国国务院在经费上的支持。1977年，安格尔退休后，任这个机构的顾问，聂华苓接替他为这个组织的主持人。

聂华苓夫妇是“国际写作计划”这个国际文学组织的建筑师。仅从1967年至1979年这12年间，全世界50多个国家350多位作家曾在这里从事创作和交流。为了办好这一机构，这对夫妇从筹款，到客人吃住、接送，事无巨细，无一不亲自操作，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和精力。他们的忘我精神和卓越成就在国际文坛上广为传颂。1977年，300多位世界知名作家联合提名他俩为诺贝尔和平奖金的候选人。作家们在倡议书中写道：“安格尔夫妇是实现国际合作梦想的一个独特的文学组织的建筑师。在艺术史上，从没有一对夫妇这样无私地献身于一个伟大的理想。”

1981年，聂华苓夫妇荣获全美国五十个州的州长所颁发的“文学工作

奖”。同年5月，聂华苓荣获杜布克大学和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同时颁发的文学荣誉博士学位。

作为一个炎黄子孙，聂华苓还有一个崇高的理想——做一名促进海峡两岸文学交流的建筑师。1979年9月，“国际写作计划”组织首次举办“中国周末”讨论会。中国大陆作家肖乾、毕朔望应邀参加。翌年四月，该组织又举办了第二次“中国周末”的活动，中国著名诗人艾青、作家王蒙应邀参加。在这次会上，聂华苓望这样的文学讨论会“能在北京开，能在台湾开”。1982年，该组织再次邀请海峡两岸的作家代表团访美，大陆派出了以冯牧为团长的代表团，台湾著名作家杨逵等应邀前往。聂华苓举行家宴，庆祝海峡两岸作家的欢聚。并安排他们共同参观、游览、交流创作经验和计划，使骨肉同胞增进了了解，加深了友情。聂华苓欣喜地表示：“海峡两岸的作家终于有机会聚在一起探讨中国文学了。”

30年来，聂华苓虽然身居美国，但对生她养她的故土，始终魂牵梦萦！她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她说：“如果把我比作一棵树的话，那么，我这棵树的根就在大陆，我的树身在台湾成长，我的家庭、事业到开枝散叶应该是在美国。”近年来，聂华苓夫妇曾多次回故国家园访亲拜友，对中国发生的变化，感到由衷的喜悦。

驰名世界的作曲家——周文中

1967年，美国出版了著名音乐评论家田舒和斯及柴斯合写的著作《现代音乐家与现代音乐》，书中分析了从19世纪末以来33位现代作曲家的艺术成就，其中只有一位华人作曲家——周文中。所以，美国音乐评论家艾·弗兰肯斯坦撰文指出：“周文中是第一位在西方音乐中留下名声的中国作曲家。”他是最具有中国美学与哲学思想的华人作曲家。

为了理想的实现

祖籍江苏常州的周文中，1923年7月28日出生在山东烟台，后来迁入青岛居住。幼年的周文中便具有音乐天赋，在家庭的熏陶下，他开始学习小提琴、钢琴，也学习其它管弦乐器。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文中一家历尽艰辛，流落到广西名城桂林。在那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岁月里，哪里还有学习音乐的条件。周文中进了国立广西大学土木工程系，后来又转到重庆大学建筑系读到毕业。这期间，他总是充分利用课余时间研读西方音乐理论和文学名著。

1946年，周文中获得耶鲁大学奖学金到美国深造，攻读土木工程学。一年过后，他对自己的专业兴趣不大。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毅然放弃已经获得的奖学金以及在土木工程方面取得的学分，转业专攻作曲。他首先考入波士顿市的新英格兰音乐学院，然后转考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1952年又获该校的莫森培奖金，进入这所大学的研究院专攻作曲和音乐学。许多人对周文中的行为难以理解，而他对此仅付之一笑。

在美国，周文中曾追随作曲家、指挥家史洛尼姆斯基、龙宁，以及现代音乐大师，法国著名作曲家伐雷兹等人学习，收益极大。

学生时代，周文中便崭露头角。1953年，在旧金山市举办的一次音乐会上，由美籍著名波兰裔指挥家史托考斯基指挥，旧金山交响乐团演奏了周文中的作品《花落知多少》。这首管弦乐曲虽然不长，它取材于中国唐代诗人孟浩然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周文中运用西方现代音乐的手法，将古代东方的传统美学观念和哲学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演出轰动了美国西海岸。一夜之间，周文中便成为众人瞩目的青年作曲家。1960年前后，这首名曲在纽约、费城、旧金山、东京、西柏林和汉堡等地相继演出，受到热烈赞扬，美国音乐界一度出现“周文中热”。

1954年，周文中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音乐硕士学位。从此，在五线谱的格子里，他开始谱写人生的新乐章。

中西合璧的大师

周文中的教学和行政工作是十分繁忙的，因而创作的乐曲并不多，已经出版的只有20余首曲子。然而他却能够跻身于国际著名作曲家的行列，这是由于他能够将中国古典文学艺术与西方现代音乐融为一体，独具特色，因而倍受各方的赞誉。

他早年的一首管弦乐曲《山水》，是根据中国古典诗词、书画境界及美感创作而成，在曲式上尽量避免西方和声的运用，力求乐感上的古朴、流畅

和抒情，色彩浪漫，其效果就像弹奏中国古琴一样。1953年，他写的管弦乐曲《花月正春风》，便取意于李后主的《忆江南》。1955年，他创作的钢琴独奏曲《阳关三叠》，便是取材于唐朝诗人王维的《渭城曲》“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1963年，周文中创作了《行草》这首乐曲，他运用长笛和钢琴相融合的演奏，放弃琴键采用内部钢弦拨弄的手法，描述了中国古代草书那种行云流水，飘逸自然的气韵，效果极佳。1965年，他完成的名曲《渔歌》，既保持了中国古琴音乐之神韵，又运用了西洋乐器的演奏技巧，充分体现了古今中外的乐艺精神。

周文中所创作的乐曲，具有集古今中外艺术于一炉，兼东西方文化优点的特色，因而抒情、浪漫、自然、流畅，令人耳目一新。他的一些曲子被世界各大乐团经常演奏，并获多项国际大奖。

周文中的作品对美国的音乐具有强烈的影响力。他在1963年获全美国文艺协会奖，在1965年又获考善莱基金会奖。1984年，为了庆祝美中通商200周年，纽约“华美协进会”设立了一年一度的“青云奖”，以便奖励为增进中美两国友谊而作出卓越贡献的美籍华人。1985年获得此项殊荣的两名华人，一位是“物理女皇”吴健雄，另一位就是周文中。

热心美中文化交流

周文中是一位热衷于美中文化和艺术交流的社会活动家。

早在60年代中期，周文中便与一位以表演中国舞蹈闻名的美国舞蹈家菲亚·戴尔莎合作，在纽约市的布鲁克林艺术馆举行联合演出。戴尔莎女士表演了根据中国历史上的爱情和战争故事改编的中国古典舞，由周文中配以音乐。她每次表演前，先向观众解释舞姿的意义和故事内容，使观众能够了解和欣赏中国剧艺的特点和价值。因而演出倍受欢迎。

1972年12月，周文中第一次回到阔别26年的故国省亲。通过一个多月在各地的访问，他感到有必要通过美中的文化交流，以促进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1977年，他再次访问中国，与许多著名的音乐家建立了友谊。1978年11月1日，由他发起并支付经费，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一个民间组织——美中艺术交流中心，周文中亲自担任主任。这一组织的任务是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发扬光大中华文化。经过周文中的多方努力，得到美国许多民间团体的响应。

这一团体建立后积极展开活动，先后为400多位美国和中国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在对方国家进行访问、学习、研究、表演、授艺、讲课和举办展览等活动，提供资金和进行组织工作，对促进两国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它为大陆与台湾海峡两岸艺术家之间的交流也起了促进的作用。

周文中这位博学的学者关于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性，有精辟的见解：“中国的隋唐时代是中国文化和艺术发展的一个高潮时期。这时，中国和中亚、东南亚各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密切，文化交流频繁，唐代的音乐空前繁荣。我们今天正面临中国文化和艺术发展的又一次高潮，对外国文化和艺术的大量吸收、消化和融合，将会促进这个高潮的到来。中国和美国的文化交流，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我是乐于为这个伟大工程贡献一些力量的。”所以，他认为，20世纪乃是东西方音乐开始融合的时代，其规模远远超过盛唐时代；未来的东西方音乐必定有互相融合的一天。在将来的世界音乐中，中国

音乐将是它重要的组成部分。周文中郑重地表示：“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我将努力耕耘。”

享誉国际的抽象派画家——赵无极

法籍华裔画家赵无极是享誉国际的抒情抽象派画家，被认为是“第一个将中国传统美术带入世界画坛的画家”。他的作品除了油画外，版画也不少，还有水彩画和水墨画，曾先后在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过 150 多次个人画展，参加联展更是不计其数。他的作品被 40 多个国家的美术馆、博物馆所收藏，其中不少还以法、英、日文多种文本出版。

潜心学画

祖籍江苏镇江的赵无极于 1921 年出生于北平，后来全家迁居上海。赵家是个书香世家，父亲虽是一位银行家，但十分喜爱绘画，收藏有丰富的古文典籍，其中有米芾和赵孟頫的名画。这使赵无极从小就在家庭里受到艺术熏陶，与绘画结下不解之缘。

1935 年，赵无极在杭州艺专读书，在名师林凤眠等人指导下，潜心学画。抗日战争爆发后，艰苦的生活激励着赵无极奋发向上，他不仅学习中国画，也学西洋画，同时广泛博览中外画报杂志，欣赏中外绘画佳作。当时，他的叔叔经常从法国给他寄来或带来欧美名画复制的印刷品、明信片等，使他对西洋画产生浓厚的兴趣，酷爱雷诺·塞尚、毕加索、马蒂斯等艺术大师的传世之作，这对他后来的艺术道路影响至深。

1941 年，才华出众的赵无极毕业后，便留校任讲师。在实践中，他意识到中国的绘画，包括自己的作品在内，无论内容和形式都需要来个“锐变”，否则便陷入僵化，所以应当向西洋画学习，取其之长。

中西艺术的融合

1948 年，赵无极赴法国留学，来到了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巴黎。当时，巴黎洋溢着浓厚的艺术气氛，许多有成就有名望的画家都云集于此，使他能够结识不少画坛巨匠，有的还成了挚友。

在巴黎的学习生活是相当艰苦的。刚踏上这座艺术之都，赵无极一句法语都不懂，经济又十分拮据。他靠省吃俭用度日，有时仅能买一块牛排，切成肉丝炒洋葱，分成几餐吃。他全身心地集中精力作画，竟能数日夜以继日地作画。为了开阔视野，他遍游法国，并到过意大利、英国、美国、埃及等国的大城市，进行实地考察，寻访著名的建筑、雕塑，欣赏古代艺术大师的作品。他曾感慨地说：“作为一个画家，不仅须善于用线条和色彩，还须有蕴蓄内心深处的诚挚感情。一幅佳作，形式和内容是浑然一体的，画家只是透过线条和色彩把内心感情表达出来。”赵无极勇于探索，善于吸收东西方文化艺术的精华，很快形成了自己绘画的独特风格，崛起于异国画坛，受到各国画界的推崇和赞扬。就在他到巴黎的第二年，便成功地举办了个人画展，获得“画坛奇才”的称谓。

赵无极的艺术风格是在逐步转变中形成的。刚到法国，他的画是具像的，是一种风景朦胧飘渺的画，并向抽象手法进行试探。比如，从他 1950 年描绘的意大利南国风光的《阿列佐》，1952 年的《山与鸟》和《港口船只》等画幅看，其街道、房舍、人物、鸟儿、树木等都是仍有着形象的，但是，这些

形象已经变成了细致、均匀而又简单的线条了。而画面上显现出来的颜色，几乎已经近乎单色的橙黄透着绿或者赭赤的了。这便是赵无极的绘画艺术由“具体的”走向“抽象的”，由“形象的”走向“非形象的”第一个阶段。

1953年以后，赵无极更趋于抽象的表现，他利用非写实的造型色彩和纹理来构图，画面充满节奏和动感。比如，1954年创作名为《风》的画面上，在暗紫色的阴森氛围中，在靠左上方配上两行类似甲骨文一类的符号，但在右方却是一脉浅色的灵光，有如风势一般地自上而下地直冲下来，给人一种似天书石碣般神秘的气息。赵无极用这种又像文字，又像符号来装饰画面的作风，延续了好几年，其代表作有《树林边沿的白色乡村》、《我的父亲的花园》、《暴风雨之前》、《火灾》、《我的祖国》、《献给米肖》、《纪念美琴》等等。

从14岁学画起，赵无极几十年如一日，勤奋作画，挥笔不止。绘画成了他最大乐趣，每天工作10小时左右。他主张画家总要有点傻气，乐于为画事受苦、牺牲，他曾对人说过：“如果三天不作画，就难受了。”“画画就是每天给自己找麻烦，每天进行自我批评。”

由于在艺术上取得卓越成就，赵无极曾多次获得国际艺术奖。1955年获美国卡纳基国际画展奖；1960年获法国文化部文学与艺术勋章；1975年获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和文艺骑士称号；1980年又获得法国骑士荣誉勋位；1984年再次获得更高级的荣誉骑士勋位。

事业上的成功，使赵无极对中国的绘画艺术也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中国的绘画历史很悠久，有自己的优良传统，应该继承和发扬，但是不能一成不变地抄袭。因此无论是继承祖先的遗产，还是向西洋画学习，都不能是模仿，最重要的是画家的创新精神。因为20世纪的绘画，应该有时代的特色，这是历史的潮流。就拿自己的抽象画给当代青年观看，也已经是古典的东西了，所以他自己也要不断探索，更好的推陈出新。他特别强调在进行东西方艺术交流时，向西方学习要有选择，不必盲从认为西方一切都是好的，其实西方的绘画也有很多是受东方影响的，如空间安排，透视方法，色彩使用等等，我们要善于取长补短，丰富自己的艺术内涵和表现手段。

赵无极将中西两大艺术传统熔于一炉的独特风格，得到各界的好评。法国现代艺术博物馆一位馆长曾指出过，赵无极的作品是“中国的本质，外加法国现代的风格，两者揉合，成了他的艺术。”旅居意大利的著名华人画家肖勤是这样评价他的创造：“他成功地将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用现代艺术的手法表现出来，他把中国艺术中的意境、气韵、抽象性，以现代语言介绍给世人，并将现代性带入中国的传统艺术中，而打开了僵化300多年的新契机，指出了中国艺术走向世界性的成功道路。”

故国情深

长期生活在异国的赵无极，始终眷恋着故国。他曾表达过这样的情感：“我非常热爱生我养我的中国，我很骄傲自己是中华的子孙。我所得到的荣誉既属于法国，也属于中国。如果说，巴黎影响我整个艺术家的形成；那我也要强调，与此同时，我也重新认识了中国。我的作品都表达了我那与生俱来的中华本质。这与一般人的说法正好不同，我是在巴黎回归到自己源远流长的文化中去。”

1972年，赵无极首次回到阔别20多年的中国大陆。之后，又多次回来参观访问，到过北京、上海、杭州、广东、西安等许多地方。1974年，他偶然看到一本陕西户县农民画册，中国农民纯朴清新的画风深深打动了。他亲自到该地考察，回国后将它介绍给《巴黎双年画展》，轰动了巴黎和欧洲。1981年10月，他非常高兴地接受中国美术家协会的邀请，到北京参加中国画研究院成立典礼。他称赞中国画研究院举办的第一届画展，既有传统风格，又有创新精神。他认为中国画的前途是光明的，希望中国绘画走向世界。1982年，他应自己的莫逆之交，著名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先生之邀，为北京香山饭店作了两幅水墨画，为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锦上添花。1983年，中国美协先后在北京、杭州主办《赵无极画展》，吴作人为画展写了序言，郁风撰文《赵无极——在东西方之间》，评介他的作品和创作道路。这两次画展，观众踊跃，盛况空前，在中国画坛引起很大的震动。赵无极激动地说：“我开过的画展很多很多，但这次画展对我的感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许多画家、艺术家得到自己国家的承认，往往要比其他国家晚，甚至要在其死后。我非常高兴中国现在就已经承认并接受了我的作品。”

赵无极十分繁忙，但他还是接受了浙江美术学院（前身为杭州艺专）的邀请，重游了阔别35年的母校，受到全校师生的热烈欢迎。他在那里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中秋节，还观看了青年学生的画画，帮他们改画。他觉得应当给青年画家特别是中国的青年画家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希望中国的画家不仅仅是区域性的画家，而且很快地成为世界性的画家。”

在巴黎，赵无极总是热情地接待来自中国大陆的一批批文化各界的人士，为促进中法文化的交流，倾注了自己的心血。

东方冰坛明星——陈婷婷

1981年，当年仅13岁的美籍华人运动员陈婷婷荣获世界花样滑冰冠军的消息传开，顿时引起了轰动。因为这颗冰坛新星的出现，打破了自1896年举行首届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以来，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著名的花样滑冰手几乎都是清一色西方人的局面，同时对那种认为东方人身材和体质先天不足的谬论给予了有力的驳斥。

慈母的苦心

陈婷婷的成功，除了得益于教练的训练有方之外，她母亲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在现代体育史上，恐怕很难找到一位体育妈妈的妈妈，能像张曼这样为女儿的事业操心。

陈婷婷祖籍广东四邑，父亲是一名从事人造卫星研究的博士。母亲张曼于1961年赴美留学，曾获图书管理学硕士学位，婷婷是她的长女，1968年3月18日出生在美国圣地亚哥市。张曼为什么会引导女儿学滑冰呢？那是因为她受到一幅国画深深的感染。

1746年，中国清代著名画家沈源在《冰嬉赋图》中，曾对当年的滑冰表演作了生动的描绘。人们能够从这幅画面上看到“金鸡独立”、“哪吒探海”等等花样滑冰的优美姿态。比起奥地利人举办的第一届世界花样滑冰的比赛，精彩的《冰嬉赋图》的问世，还要早上100多年。然而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在冰坛上却长期默默无闻。正是出于“替中国人争一口气”的想法，张曼产生了把婷婷培养成一位优秀花样滑冰运动员的愿望，并为此付出毕生的精力。

陈婷婷8岁那年，他们家住在加州的圣地亚哥。一天，张曼带女儿去逛商店，正巧遇上商店清仓大拍卖，婷婷相中了一双溜冰鞋，吵着要买，张曼只花了一美元便买下了这双玩具冰鞋。婷婷穿上它在冰上行走，几次之后，薄薄的两把铅制刀片就弯了，但这没有影响她学习的决心和兴趣，仅仅溜了一个月，婷婷的水平就和已经训练过一二年的孩子溜得一样好。从此，婷婷迷上了滑冰，每天放学回来，一定要在冰场上练上几个小时，直到把滑冰的基本动作全部掌握为止。随后，她正式拜名教练为师，开始进行系统、正规的训练，进步飞快。

体育训练是单调、艰苦的。每次训练下来，陈婷婷不仅汗流浹背，还常常碰得浑身伤痛。往往有些小女孩出于好奇，玩上一段时间，受不了这种苦便打了退堂鼓。陈婷婷却与众不同，她确定了自己的目标，每星期坚持训练30个小时，从不间断。这么大的运动量，对于一个正在上学的女孩子来说，既要有坚强的毅力，同时要付出极大的辛劳，陈婷婷终于挺住坚持下来了。

滑冰是一项费钱的运动，一双高档冰鞋价格五百美元，七八个月就得替换一双，张曼对此毫不吝惜。婷婷上滑冰课的雪内特滑冰场，离住家110公里，她每星期得去三次，每次上课4小时，都是张曼开车接送。当张曼开车在路上来往奔驰的时候，婷婷就在这辆旅行车里睡觉、进餐和做功课。其它四天则到北好莱坞的一个滑冰场练习。课程安排得相当紧。为了女儿的事业，张曼卖掉了经营多年的餐馆，连婷婷的父亲也开始出售自己用于各种设计和试验的器材。后来，为了就近训练，减少途中的时间，张曼和家人商量，在

6年中竟搬了3次家。全家人省吃俭用，以便支付婷婷每年三万美元的训练费用，数年间其费用不下15万美元。

上了高中后，婷婷一学期要修三门课，还要参加暑期进修班，因此，她一年到头都在读书。有一家电影厂想抓住举办奥运会的机会，邀请婷婷担任影片《高飞》的主角，张曼替她谢绝了。张曼说：“我们希望婷婷全心全意地滑冰，一心一意地上学，拍电影会使她分心。”

每天，婷婷练习时，张曼总是尽心尽力做好各种准备，坐在一边进行严厉督导。因为她知道，滑冰是一项很复杂的运动，如果有一天准备不够周到，就可能会一下子毁掉一个人的一生。张曼为女儿操心的不止是训练方面的事情，对各种运动创伤的治疗方法，她都打听得一清二楚。

为了女儿的滑冰事业，张曼不仅舍得花费钱财和时间，而且要求十分严格。当婷婷在训练中碰到困难，甚至想打退堂鼓时，张曼总是激励她：“绝不允许你半途而废，中国人要干就得干出个样子来。”1985年3月间，陈婷婷随世界冰上名星队到北京来表演。一天晚上，在结束训练项目之后，陪同来京的张曼听说女儿与别国的选手欢聚并喝了点酒，她又生气又焦急，连忙打电话告诉婷婷：“你不应该在那里久留，更不应该在那里饮酒。你应该抓紧时间休息，你应该知道如何要求自己。”事后，张曼还气愤地对身边的人说：“如果喝酒能喝出滑冰冠军来，那我们就不要冰场，干脆到酒馆去好了！”

滑冰皇后

功夫不负苦心人，在教练的严格训练和张曼耐心地启发和帮助下，陈婷婷在训练中十分刻苦，频频获得优秀的成绩。

1980年，年仅12岁的婷婷初次参加全美花样滑冰锦标赛，便获得青少年组第四名。1981年，她在安大略夺得青少年组世界滑冰锦标赛冠军，成为美国最年幼的滑冰冠军。1982年，她第一次参加成年组比赛，在全美滑冰锦标赛中夺得第五名。1983年，获得全美滑冰锦标赛第三名。

陈婷婷首次荣获冠军的那天，她的母亲坐在观众席间，望着精神抖擞的女儿，不禁热泪盈眶。这欢呼和掌声正是对她们一家人辛苦奔忙多年的最好报答！

1984年，陈婷婷被选入美国奥林匹克队后，便在著名花样滑冰教练尼克斯的指导下，进行滑冰、芭蕾舞、体操和体力的综合训练。每天长达四五个小时的训练结束时，陈婷婷常常累得全身像散了架子一般，她总是默默地承受着。

就在这一年，她又取得更为突出的战果：获得全美滑冰锦标赛第三名，美国西太平洋地区滑冰锦标赛冠军。她又前往南斯拉夫萨拉热窝参加冬季奥运会，在强手如林的高水平比赛中，她果然身手不凡。陈婷婷表演的“陈氏旋转”的绝技动作是她的独创。她先抬高右脚，身体前倾，接着连续像车轮般翻滚8圈，似燕子展翅飞翔，最后得到最高的分数。

从冬奥会返美后，陈婷婷在一次训练中意外地脚被扭伤造成骨折。在这突如其来的打击面前，陈婷婷毫不退缩，积极养好伤之后，又争分夺秒地投入到更为紧张地训练中，终于把养伤期间耽误的时间夺了回来。

1985年2月2日下午，在堪萨斯举行的美国花样滑冰锦标赛中，陈婷婷

身穿粉红色短裙，以优美的舞姿和精湛的技艺，力挫群芳，更以高难动作“后内点冰三周跳”和“后外点冰三周跳”令人目不暇接，如同一颗急旋轻转的灿烂华星骤然落定。一举夺得美国女子单人滑冠军，这位年仅 17 岁的华裔姑娘，脸上绽出美丽的笑靥。

美国《体育画报》描述她的滑冰风格是“幻觉和力量的结合”，还有的报刊评论说，陈婷婷的冠军风采，是美国历届“滑冰皇后”所罕见，为电视机前的美国冰迷们所倾倒。在滑冰道路上她来势如此凶猛，被冰场观众戏称为“蒸汽压路机”。

成名之后

陈婷婷的成功在美国华人社会中也引起了震动。这位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华裔“滑冰皇后”，像美国许多有成就的华裔企业家、科学家、学者一样，正激励着华裔的年轻一代，同时也给他们有益的启迪。

陈婷婷身材苗条，体态飘逸，天生一副滑冰的好身段。她的冰上动作，宛如流动不定的水银，揉合了光和力的美。崇拜她的观众亲昵地称她“搪瓷娃娃”。她高兴地表示：“我已经习惯人们称我‘搪瓷娃娃’了。在我很小的时候，人们就这样称呼我。这使我更加知道从中国的文化中去发掘力量。”古老悠久的中国文化气息在婷婷家中处处可以感受到，对她的滑冰风格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她总结自己的滑冰体会说：“滑冰的秘诀在于刚柔相济。滑冰运动比表面看来还激烈，但是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有些人表现得锋芒毕露，咄咄逼人，我则像穿衣服一样将它裹起来。”可见她把握的滑冰原则是既充满力量又健美娇柔。教练尼克斯十分赏识自己学生的这种风格，说道：“现在，全美国没有其他女孩子能像婷婷那样，在滑得优美的同时又那么充满力量。这种含蓄的内在的气质，全场的观众都可以感受到，这是她获得胜利的原因之一。”看过婷婷表演的人士评论说，她的表演既有冰刀世界的典雅优美，又有常人素有的欢乐喜悦，所以她的表演很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情不自禁地为她鼓起掌来。

花式溜冰运动最重要的便是面部表情，在这方面陈婷婷表现出世界一流水准。在她溜冰时，面部总是挂着甜甜的笑容。来看她表演似乎都忘记了冰场外的烦恼，随着她优美的肢体动作进入和谐美好的世界。陈婷婷对配乐的理解也有独到之处，她以“身体语言”款款说出音乐的意境，可见她能听音乐、舞蹈融入溜冰，而具有“丝丝入扣”的功力。

为了专心于自己的事业，报纸上赞扬陈婷婷的文章，她一律不看；冰迷们写来的信，她总搁置一边；以她为中心的应酬活动，她总是尽量婉言谢绝。为了避免惹人注意，婷婷出门故意不打扮。这些作法，她的母亲十分满意，她说：“这样就不会有让人宠坏她的危险。”

1985年3月，婷婷偕同母亲随美国滑冰表演团来北京演出，受到首都观众的热烈欢迎。当她登上万里长城极目远眺，深为自己是炎黄子孙而自豪。她表示说：“大家对我真热情，到处都有人叫我的名字。中国人之间是很容易相通的，我还要回中国来！”有一次，当记者问她：“生活中最使你高兴的是什么？最使你痛苦的又是什么？”陈婷婷略为思索一下，说道：“最使我高兴的是取得金牌，最使我痛苦的就是不能充分地表现自己已经掌握的技术。”

这位冰坛明星并不满足已经取得的成就，她给自己安排了许多计划，为攀登新的高峰而继续奋斗。

鳄鱼大王——杨海泉

你听说过举世闻名的“鳄鱼湖公园”吗？它坐落在泰国首都曼谷市南面 25 公里的北榄府，占地 100 公顷，养殖着世界各地不同种类的鳄鱼 4 万多条，此外还有各类飞禽走兽。这里花红柳绿、满地芳菲，是一个迷人的旅游胜地。凡是到泰国来访问的政界要员，或者游客，大多要到这里参观游览。这座公园的创建者是泰籍华裔杨海泉，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

艰难岁月

祖籍广东省惠来县的杨海泉，1926 年生于泰国北榄府海口村，自幼家贫，断断续续上了四年学，便不得不为生计操劳。但他求知欲很强，经常利用工余时间阅读书报，尤其爱读历史故事和名人传记。由于他活泼聪颖，勤勉过人，10 岁那年，他被一位在外国银行当买办的刘木通先生收为义子，带进银行做事。两年后，杨海泉有了一笔积蓄，他想不能永远受人庇护，以杂役终生，便向义父辞职，决心自己闯荡天下。刘先生看他胸怀大志，便不加阻拦。从 15 岁起，杨海泉先和两位朋友合伙开了一间小杂货铺。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在一次飞机轰炸中，殃及他的小店，致使血本毁于一旦。

创业之初

失业困境中的杨海泉到处寻找生路。一日，杨海泉看到商店橱窗里有鳄鱼皮革制品销售，价格十分昂贵，令他心动。他找到一位猎鳄鱼的朋友聊天，交谈中得悉，在捕杀鳄鱼时，许多幼鳄往往夭折，十分可惜。杨海泉想，如果把这些幼鳄畜养起来，待长大后才宰杀，不是更有价值吗？

经过大约半年时间搜集资料和研究，他拟订了一套保鳄、养鳄和繁殖鳄鱼鱼的方案。可是，他身无分文，如何实现自己的计划？天无绝人之路，适逢他二哥的生意顺利，慨然拿出 500 铢泰国币给他。他用这笔钱做起了收购鳄鱼皮的生意。同时，他还扮成猎鳄者深入山区，拜访猎人，对鳄鱼的生态作了进一步的了解。不久，他便在自家住宅附近挖了一个小池塘，筑成一个白灰土池，很廉价地买些幼鳄畜养起来，有时捕鳄者还将幼鳄白送给他。

刚开始，朋友们都很不理解杨海泉的养鳄事业，甚至有人认为他是疯子，纷纷劝阻。他的母亲更是气恼地以“养虎伤人，杀鳄积恶”为理由，极力加以反对。杨海泉理解亲友们的心情，畜鳄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人们越是嫌弃而且畏惧，他更要坚定地做下去。他泰然自若地说：“只要我所从事的事业是正当的，我将不计较其贵贱，更不怕其危险！人家不为，我可以为；人家不能为的，我更需要为。猪、牛、鸡、犬等皆可豢养，为何鳄鱼就要例外。”

人工养幼鳄完全是一件新事物，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做为先行者的杨海泉自然要有胆识接受磨练。幼鳄的生长机能十分脆弱，对气候尤为敏感，常常因为受惊便发生痉挛而生病，严重时便成为残废或死亡。杨海泉日夜观察，逐步掌握了幼鳄的生活规律，终于解决了护理上的技术难题。他后来跟人谈起这段经历，感叹道：“这项工作的认真细致，比哺育婴儿更难。”

幼鳄喜欢噬食水族中的鱼虾小动物，有时还要吃肉，饲养费用很高。幼鳄日益长大，小小的池塘自然容纳不下，急待扩建，沉重的经济负担压得杨

海泉透不过气来。为了维护自己的事业，他被迫宰杀一部分接近规格的鳄鱼，以便换取资金。

过去，泰国的鳄皮大多是猎户在捕获现场宰杀的，设备简陋，工序马虎，皮质损伤大。杨海泉经过研究和改良，增设屠宰用具，钻研操刀技术，大大提高了鳄皮质量，深受客商欢迎，盈利颇丰。于是，他自己包揽了鳄鱼皮出口业，组建经营机构，直接与国外客商往来，使他的商行名声越来越大。杨海泉边畜养边宰杀，不仅解除了经济危机，养殖业也越办越兴盛起来。

鳄鱼王国

鳄鱼，在泰国笼罩着一层神秘的光圈，充满着神话色彩。它虽然又丑陋又凶残，但使用价值极高。除了鳄皮是高级服饰皮革外，鳄肉、鳄脂、鳄血、鳄胆、鳄骨、鳄牙都可以入药，为人医疾祛病。因此，全世界都在捕杀鳄鱼，其数量日益减少。

杨海泉创业的成功，使他进一步懂得，仅仅停留在收购野生幼鳄加以畜养待宰，等于“扬汤止沸”，不能挽救野生鳄鱼濒临绝迹的厄运。经过分析，他得出结论：唯有采取留种、保种的方法，进行人工繁殖，这个被称为“亿年活化石”的鳄鱼才能摆脱灭绝的危机。

1955年，杨海泉选中富饶的渔港北榄开辟养鳄湖。这儿处于湄南河下游出海口处，咸淡水交汇之滨，河港交叉、林荫密布，特别适合鳄鱼的繁殖生长。这里又是他的出生地，他说：“生于斯而创业于斯，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具优。”他先后购进了100公顷的土地，建筑了规划整齐的养鳄池，还设置了几处野生形态的鳄池。里面栖伏着世界各地不同种类的4万多条鳄鱼，其中泰国最优秀的“霸王系”品种格外引人注目。到了70年代初，该湖成了举世瞩目的最大规模的人工养鳄鱼湖。世界各地的猎鳄家不少，但畜鳄家仅只杨海泉一人，这足以使他名扬四海。

1971年3月，10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在纽约召开国际保鳄会议。杨海泉是泰国的唯一代表，他在会上详细介绍了丰富的养鳄经验，论述了泰国近半个世纪来的鳄鱼生涯。最后，他自豪地宣布：“泰国鳄鱼重新繁殖有希望了！”他那娓娓动听的介绍，引起了各国专家极大的兴趣。事后，很多人千里迢迢去他的鳄鱼湖参观学习。

1973年，国际保鳄会议就在泰国北榄养鳄湖举行，以表彰杨海泉的杰出贡献，宣传他的先进经验。一个几乎未曾读过书的穷孩子凭着自身的努力，走上了国际最权威的鳄鱼专家行列，缔造了一个“鳄鱼王国”。

杨海泉并没有沉醉在自己成功的事业中，从70年代开始，杨海泉就把养鳄业和旅游业结合起来加以综合经营。经过逐步改造，他将养鳄湖对外开放，鳄塘之上有九曲天桥，游人徜徉其间，举动缓慢的鳄鱼的栖息活动，可以一览无余。

除了鳄鱼湖，这里还辟有动物园、游乐园，养着熊、虎、豹、象、狮子、巨蟒、骆驼等动物。其中大象跳舞的表演也令人称奇。终日在此玩赏，游客兴味盎然。参观者络绎不绝，每年接待游客达100万人以上。

杨海泉说过：“任何人对从事的任何事业都要爱，要喜欢，才能获得成功。”由于他对养鳄事业做出突出贡献，因而获得泰国劳务企业唯一的最佳奖。

生长在泰国的杨海泉，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普通话，对故土，他有难以形容的深情，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也有深入的了解。中国人民对他的事业也给予了关注。中国乒乓球队曾集体到他的“鳄鱼王国”参观，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1985年2月，当时担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李先念率团访问了鳄鱼湖，对他的事业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后记

地球上，海水能够到达的地方，便有炎黄子孙辛勤的足迹。从世界范围来说，侨居在国外的华侨和华裔的历史，就是一部创业史、血泪史和爱国史。他们对侨居国的开发、建设和发展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与此同时，他们也无时无刻不在怀念着自己的故国家园、父老亲朋，总是竭尽全力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支援和帮助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涌现出许多令人敬慕的人物和难以忘怀的事迹。

笔者通过国内外有关机构广泛收集了亚洲、欧洲、澳洲和美洲各国华裔和华侨的杰出人物，编写成这本小册子呈献给青少年朋友。如果你们阅读之后，能够开拓视野，受到鼓舞，增强爱国的意识和情感，并能付之于自己的学业中，逐步把自己锻炼成祖国建设事业的合格人才，我们将深感欣慰。

编写此书过程中，得到马来西亚华社资料研究中心和陈亚才先生；大马友人李锦宗先生；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资料室和谢成佳同志的大力支持，使笔者得以参阅和借鉴前人的许多研究成果，藉此书出版的机会，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